



## 编者说明

本专辑是《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著，指的是邱会作的文字；述，指的是邱会作的谈话。之所以出这一专辑，是因为自从《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问世以来，文革研究界就围绕着这两本书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以余汝信和程光为代表。余派认为《心灵的对话》不是史学著作，而是纪实文学。程派认为，余汝信是《邱会作回忆录》的责任编辑，他对《心灵的对话》的批评，出于个人目的。且《邱会作回忆录》也多有不符合史实之处。

对于“余程之争”，研究界发生了大分歧，人们提出两个理由，来劝阻这一争论。理由之一：“余程之争”是窝里斗，研究者应以大局为重，放弃分歧，一致对外。理由之二：“余程之争”的背后是邱氏兄弟之争，它将邱氏的家庭矛盾引入学术。批评邱会作的著述，会破坏邱氏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云云。

我们认为，“余程之争”是关系到史实、史德的大事。学术不是政治，求真求实才是大局。不是学术卷入家事，而是家事干扰了学术。本刊既为学术平台，就应该秉持兼容并包、中立公正之立场，全面反映各方观点。

## 《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目录

### 【特稿】

[迟泽厚 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

### 【评论】

[余汝信 谁离真相更近——《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

### 【访谈】

[刘先生 邱会作访谈](#)

### 【往事】

[蒋平安 我的回忆——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

### 【争鸣】

[卜伟华 在学术争论中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更加严谨——与余汝信先生商榷](#)

[余汝信 回应程光](#)

[肖百友 应该看到两本书大体上的一致](#)

### 【文摘】

[《当代广东》编辑部 学习当代史的若干感受——迟泽厚访谈录](#)

### 【编读往来】

[1、童话回复鲍国芳](#)

[2、魏明珍介绍王友琴谈宋彬彬的文章](#)

[3、陈建华谈“百度百科·宋彬彬”词条](#)

**【特稿】**

按：此文为迟泽厚给《文史参考》写的稿子，承蒙作者俯允，本刊以特稿形式发表。谨此致谢。

迟泽厚，1931年出生，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5月由四野调入中南军区司令部，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文革期间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1987年离休前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离休后，以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为职志，有多篇重要文章问世。

**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

迟泽厚

《文史参考》第46期刊登了丁东先生写的一篇《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文章的题目很吸引人，不由得看了几眼，竟然发现那位打人的班长属于第四野战军第48军，而我当年正是48军政治部的干部；再看该文所述情景及时间、地点，恰恰我当时正跟随48军军长贺晋年和政委陈仁麒率领的军指挥所行动，就住在邱会作的家乡兴国县城，而且我当时正被领导指定做群众工作，对这件奇事竟一无所知，堪称咄咄怪事。丁东先生的文章是根据程光所著《历史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中所记的一件事情写成，据说是邱会作亲述：在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过程中，48军直属队的一个班住在他家中，因为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强吃了他家的谷，又杀了他家的猪，他父亲还挨了班长的打，这位班长并罚他父亲挑炮弹去兴国县城。丁东据此作了一番评论：“大军南下，气势如虹”，但是，也不应掩盖背后的阴暗面，而“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我又认真看了一遍该文，不禁掩卷沉思，继而喟然长叹，因为这段所谓邱会作的亲述，纯属编造，而造假者，即《回顾》一书的作者，竟是邱会作将军的儿子。

## 一、“邱父挨打”破绽十出

人们常用“破绽百出”来形容一些不合情理的文章。关于邱父挨打的陈述只有四五百字，自然不可能有百处破绽，但我至少也可以指出10处：

一、该文称，邱会作是“从四野下发的战报”中，得知东路大军已打到赣南。其实，这类消息当时都是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新华社在四野政治部设有一个总分社。四野总部不发这类战报。

二、该文称，住在邱父家中的那个班，是因为“给养一时供应不上”，才强吃邱家的稻谷（应是大米）并杀猪的。实则当时并未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48军军部和直属队是7月31日晚间从高安一带向赣南进发的，当时永新、泰和以北地区都已解放，初步建立起地方政权，大力支援部队开进。由于时值三伏酷暑，又无敌情顾虑，部队在吉安以北都是旅次行军，一般是夜行晓宿，因而部队不太疲劳，供应也有保障。从泰和以南部队转入战斗行军，从泰和到兴国不过一两日行程，无论如何也不应发生因断粮而与民争食的情况。再说，“一时供应不上”就能成为强吃民粮特别是杀猪的理由吗？

三、无论是部队还是农村，在60多年前杀猪都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像土匪似地强杀老百姓家的猪，这可不像在瓜地里偷吃或强吃群众一个甜瓜那么简单。而且，一个班不过十人左右，居然能杀掉、吃掉房东的一口猪！我在48军军部工作了4年有余，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奇事。因为工作关系，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与邱家时有往来。我向邱家人求证此事，最后辗转得到解放前一直与邱会作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邱会作之妹邱联凤的回应，她说：“那时候全家吃糠咽菜，哪里养得起猪！”

四、我军从1949年4月开始统一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48军全体官兵是4月下旬佩带胸章南下的。兴国县城是8月8日由48军144师解放的。大约是8月9日上午，军前指队伍经高兴圩进驻兴国县城，在那里住了两天。记得经过高兴圩时，大路两旁站满了人，气氛热烈，如同趁墟（赶集）。多数群众是看热闹的，还有的是向部队打听十几年前北上的亲人的下落的——当年有上万名兴国籍的红军官兵参加了长征。邱父是个消息灵通的老革命，而在南下大军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他竟会把佩带着胸章住在他家中的解放军当成“老总”，“问

他们是什么部队”，端的是莫名其糊涂。倘若邱父真的要问，依当时情况，他应该说：“同志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五、据该文称，那位班长打了邱父不算，第二天又罚老人家“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这就奇了：稍有点军事知识的人都该知道，炮弹是不能离开火炮的，这个炮兵营的炮弹怎么能脱离火炮，先运到邱父所住的偏僻小山村，然后再运（包括邱父的挑）回兴国县城的炮兵营，岂不是胡折腾吗？顺便说一句：兴国县城很小，当时我在兴国城内没见过一门火炮。再说远点，军指挥所的驻地，谁敢安排无关单位宿营？

六、据说炮兵营教导员因为“有点文化”，听邱父讲了邱会作的名字，“知道我的职务”，“吃了一惊”，知道自己的部下打了不该打、不能打的人（看来这个营打人似是平常事），炮弹也不叫邱父挑了，给了他一块大洋，“打发他赶紧回去”。这段描绘极具想象力和戏剧性。我自信我的文化不比那位教导员低，而且又在军机关工作，但说来惭愧，当时我并不知道邱会作其人，不知这位教导员是如何知道的？再者，48军从北京地区出发，直到赣南战役之前，都没有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因而也就没有发到“洋财”，我们发的津贴费都是人民币，不知这位教导员的大洋又是哪里来的？

七、据说那位班长所在的连，把邱父挨打一事“报到了军部”（这应当是那位教导员发现打了不该打的人之后），结果惊动了军政委陈仁麒。这又外行了，连和军之间隔了几级，按正常程序，这个连是不能直接向军部作报告的。倘若逐级上报，需多日之后才能报到军部，即使陈仁麒能够看到报告，而此时他早已离开兴国了，哪里还能见到邱会作“父亲的容貌”？

八、据说陈仁麒在得知邱父挨打之事后，“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这一句话露出两个马脚：第一，45军与48军不在同一方向作战，是不能互通电报的，更何况为私事通电报也不应该；第二，48军进占兴国之时，45军还正在江西萍乡一带休整待命，邱会作既未到湖南，更未作战。

九、据说陈仁麒在核实情况后，给邱父“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48军军部拿出十块大洋可能不难，谷子恐怕一粒也拿不出来，后勤部门和地方供应部队的粮食全是大米。

十、据说邱父挨打之事连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也知道了，他很生气，“用通电的方式在全野战军批评了他们”。首先，这是一句外行话，军语应叫“通报批评”；其次，既然是通报批评，就应当广泛传达，深入教育，可是我作为军政治部的一名干部却从未听过传达。须知48军是违纪挨批单位，竟无声无息，这就更难解释。不知四野政治部的这份通报发到哪里去了？

以上是我从邱会作之父挨打的这一段文字中挑出的10处破绽。为慎重计，我决定再打电话向邱家有关知情人核实一下。邱的长子路光与我是忘年交，解放初他曾随其父回过兴国，我问他是否曾听他祖父母、父母和姑母讲过他祖父挨打的事？他说从未听说，倒是他姑姑说过“承光乱说”之类的话。我讲了我对此事的分析判断，他表示赞同。至此，我有充分理由认定“挨打”事件纯系杜撰。

说到这里，我要为48军讲几句话。48军组建较晚，在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之前所辖的13个军中，地位不算突出。但是，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部队。红军时期的“大渡河连”，抗日战争时期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的“抗日功臣炮连”和“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和被誉为“现代花木兰”的郭俊卿，现在的驻香港部队步兵旅，都出自这个部队；这个军还有两个师参加了朝鲜战争。1949年7月底这个军在受领解放赣南的任务后，专门进行了进入老苏区的群众纪律教育，整个战役期间，群众反映是良好的。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在进入兴国县城的当天下午，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彭由要我从军警卫营找几名战士，组织个纠察队上街巡查，主要查看有无违犯群众纪律现象。纠察队需要临时制作几个臂章，我找来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准备扯了红布制做臂章。彭由部长小声地嘱咐我：“喂，你可要把剩下的布头藏好，不要叫别人看见呀！”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从法理上讲，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国旗”，所以彭由才如此谨慎。这件事情颇具代表性。试想，一个如此重视政策纪律的部队，竟能听任一个小小班长对群众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而不顾吗？《回顾》随意拿48军说事儿，给这个部队扣“黑锅”，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

## 二、遭肢解的《邱会作回忆录》

我早就听说在《邱会作回忆录》出版之后，邱会作的次子程光（即邱承光）接连出版了《心灵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和《回顾》两本书，但很多人看后颇多非议，认为水分和疑点太多，很多话与邱会作的身份和一贯作风相去甚远，对《邱会作回忆录》甚至对邱本人都有负面影响；继而听说连他母亲和他的兄弟等人对他写的东西也不认可，并由此事造成家庭关系极度紧张。我只阅读了邱会作夫人胡敏大姐赠送的《邱会作回忆录》，感到受益匪浅，因还没看后两本书，当有人问我的看法时，我表示不愿妄加置评。今年9月我赴京探访故旧，路光去看我时，从良好愿望出发，我还劝路光要慎重行事，认真听取和对待弟弟的合理意见，也许他是缺少经验，分寸把握不准，只要他能接受教训，改了就好，不要为此事闹得兄弟失和，遭外人议论。

最近看了丁东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回顾》中关于邱会作之父挨打的这段文字，在吃惊之余我赶紧有重点地看了此书含有邱父挨打这段文字的第15章《工作中南军区》。不看则已，一看目瞪口呆：通篇信口开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的地步。继而我又把《对话》找来，对照《邱会作回忆录》看了我认为对其中内容比较熟悉的一些章节。看后总的感觉是，《对话》和《回顾》这两本书，实际是改头换面的《邱会作回忆录》，但是作者已经不是邱会作了。两书的作者当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表示两书是不同于原作的创作，于是利用原作的一些空档，加进一些个人的东西，或者对原作的一些段落加以改写、充填、抻拉。这种手法，一般读者如不对照原著，往往不易发现，但对于熟悉邱会作历史的人来说，则恰恰可以从中发现对原作进行肢解、拼接甚至杜撰的马脚或痕迹。这里挂一漏万地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一、《回顾》第243页假邱会作之口称：“衡宝战役歼敌7.7万余人，我们45军就歼灭敌5万余人，……击毙生俘将官十余人”；“45军歼灭敌人4个精锐主力师”。而实际情况是，整个衡宝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多人，其中有白崇禧集团4个精锐师2.9万多人，被俘（无击毙者）将官8人，但这包括了第40、41、49军的战绩。《邱会作回忆录》对这次战役的战果记述虽然也不够准确，但比较接近实际，而《回顾》的描述则太离谱了。

二、《回顾》第264页称，1951年春成的华南军区“受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领导，……管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4个省级军区”。这段文字既不符合实际，又讲了外行话。中央军委关于组建华南军区的电令中，明确指示华南军区“归中南军区领导”；把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并称为“省级军区”，说明作者不了解当时军队的编制体制，须知广西军区当时是二级军区，而海南军区则是明令规定的三级军区，粤东、粤西军区分别由第41、43军兼，也相当于三级军区。《邱会作回忆录》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还是比较准确的。

三、1952年7月，中南军区机关移驻广州，华南军区机构与之合并，人事作了相应调整。《回顾》第265页称，担任军区政部副主任的邱会作居然“还兼任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竟也随机关来到广州上班了，“林彪住在广州市东山达道路的留园”；林彪甚至还不坐汽车，走街穿巷地到邱会作家中串门！事实是，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兼任的是中南军区军法处处长，这在四野的大事记中也有记载；而林彪在南下作战结束之后，一直住在北京。留园则是广州军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在军区司令部大院中建成的小招待所，林彪也从未住过；林彪到邱家串门之事，自然更是子虚乌有了。

四、《回顾》第269页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中南军区机关移驻广州之后，陶铸在一次党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而《邱会作回忆录》中则无此记载。其实，陶铸早在1951年即去华南分局任第四书记，忙得不可开交，他虽然在军区还挂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却基本不管军区的事情了。

五、1960年1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在此之前的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回顾》第328、329页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假想敌是美国和苏联”，“北边，对苏联要顶得住；……在东南沿海，对美蒋则要实行运动防御”。我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而且会前还曾遵照林彪的意图为他准备了资料。此时的中苏关系虽已比较紧张，但还没有提出以苏为假设敌的问题，《回顾》是把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战备思想大大提前了。“北顶南放”主要是纠正平分兵力、处处设防的思想和做法，而不是因为作战对象的改变。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例证，渤海湾属于“北顶”的战区吧，这次会议之后组建的北海舰队，就是为了防备美军重走英法帝国主义的老路的。

六、《对话》第374、375页称，1971年5月，邱会作陪同越南党负责人黎笋到广州，“正在广州（从化）的朱德打电话给我，说要见一见黎笋”，邱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周恩来，结果遭到严厉批评。此处还提到李富春、滕代远等人。这段文字尤属荒诞：朱老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滕则是中央委员，他们都已在1970年7月即离开从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直至去世，再未回来。邱会作在庐山应是见过他们的，岂能健忘若此！顺便说明，《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根本无此记载。

.....

以上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据了解，两书的作者在出书之前曾将书稿请一位当代史专家看过。由于时间紧迫，那位专家只对《回顾》作了若干修改。改总比不改强，不然还会留下更多错误。

邱会作不但在四野部队而且在全军素以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明干练著称，前面所举数例，对邱会作来说，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竟能被他搅得如同一盆浆糊？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邱会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个邱会作，在《对话》和《回顾》两书中讲的许多事情，同他在《回忆录》中讲的却截然不同！那么对两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就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了！

### 三、一个老兵的忠言

目前的史学界风气不正，胡编乱造、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甚至完全作假的所谓“史作”充斥市场。当代史领域尤其如此。造成这种局面：有的是因为作者对所书之事缺乏亲身感受，手中史料不足，功力不够，勉为其难，于是只能以有限的史料加臆想演绎，让先天不足的产品带病出世。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更恶劣的是有的人心知肚明，但为了迎合社会风尚，或为了达到某种私利目的而蓄意作假。对《对话》和《回顾》两书所出现的问题，我希望是前者。

史书的灵魂是真实。一个失掉灵魂的人，最多只是行尸走肉；不实的史作一文不值。有的人写了不实的史作，一时没有被被人识破或无人出来揭发，自以为得计。岂不知假作真时真亦假，更何况西洋景早晚要被拆穿。不负责任地乱写，危害很大，代价极高。它误导读者，混淆是非，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特别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更易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信赖，“邱父挨打”这段文字，不是连见多识广的丁东先生都信以为真了吗？作假的最终受害者还是作者自己。不知“两书”的作者可曾想过，当事情的真相为广大读者所识破之时（这是必然的），那些发现受了骗的人们将会怎样看你？你将何以自处？

写史是一件极为严肃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工作，中国史学界是有光荣传统的。古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或忍辱负重以维护历史真实的壮举，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要排除各种私心杂念，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写史，此即可谓史德。古人提倡勉励士节，史德即是士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写史一定要有所得，有所感，司马迁说它是“圣贤”们“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所为作也”，切切不可勉强去写。为人子者，对父母应当是心怀崇敬的，是希望为他们增光的。两书的作者倘若感到《邱会作回忆录》对某些问题的陈述意犹未尽，尽可以诠释和补正，这类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而且同样受到读者的重视。模仿父亲的口气，另起炉灶，糊弄读者，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同时，这也必将损害邱会作将军的形象，甚至会让人对他的回忆录产生一些疑问。作为一个第四野战军的老战士，我也深感痛心。希望这种状况尽快成为过去。

2011年12月29日于广州

**【评论】**

按：此文是作者提交给“‘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文中共列举了《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45条。本刊第77期曾以《“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为题刊发了其中的二十条（即《谁离真相更近》中的4、5、6、7、9、10、15、18、19、20、22、23、26、27、29、30、31、34、42、43诸条）。蒙作者授权，兹发表该论文未曾问世之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接受司马清扬先生的意见，删去了原文中的第8条。下面刊发的是其余的24条。

**谁离真相更近？****——《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细节差异浅析**

余汝信

**一、叶说的还是林说的？**

◎ 父：1965年8月初，叶帅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对我发牢骚说：（余注：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叶帅说，他刚从大连林总那回来，两人谈了，认为罗瑞卿变了，不注意自己参谋长的身份，专横霸道，独揽大权，俨然已是军队的统帅了。——《对话》上，页10

◎ 叶谈话的要点如下：

……

**林总还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

郭兴福教学法是叶帅发现、总结出来的，罗抢了过去，并以大力推广郭兴福

教学法为由，在南京召开了全军军长以上的会议，除一个军长因病未到会之外，所有军以上的军事干部都到会了。这是一次兴师动众的“抢功”大会，大会之后并非搞军事训练，而是搞全军大比武了。-----《回忆录》上，页 378-379

同一句话，分别在《对话》里是叶剑英本人所说，《回忆录》中是叶剑英转述林彪的话。

叶剑英是熟谙历史、极具睿智的大政治家。《对话》中他对部下发这样的牢骚，有以元帅身份与大将罗瑞卿争功之嫌，想必这决非叶之所为。但如果像《回忆录》中叶剑英传达的是地位比他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的原话，此事就如同由林作了仲裁。不以自己作评判而以林彪作评判，这就显露了叶高超的政治造谐。比较起来，《回忆录》所述显然合情合理得多。

## 二、上海会议的特点

◎ 父：上海会议是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当面斗争，是“背靠背”，罗瑞卿没露面。二是畅所欲言，与会者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他承认搞“大比武”不妥，但不承认反林总，罗说他曾长期在林总的领导下工作，从无二心，“这辈子跟林总跟定了，棒子打也打不散”。三是没正式组织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召集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过火斗争，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要依照上海会议的精神办。”-----《对话》上，页 11

◎ 回想起来，上海会议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没有过火斗争。在会议期间，对“长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没有露过面。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一是承认大比武是不对的；二是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他说：“我对林副主席向来都是拥护的，从来没有过二心。在林总领导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第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任何负担。在小组会上，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

第三，没有结论。会议结束时，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全体人员开了半小时的会议。刘少奇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都平心静气地摆事实，

讲道理，没有搞斗争。回北京后，中央还要继续开会，也依照着上海会议的精神办理。”——《回忆录》上，页 395-396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是文革前夕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毛下了大决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作了周密策划，会议“扩大”到什么？怎么派专机接罗？谁去机场接罗？罗住什么地方？罗住处如何警卫控制？周、邓与罗如何谈话？都一一安排有序。会议充满肃杀之气，与会者人人精神紧张，如何会是《对话》所述的“按党内生活方式开的‘神仙会’”？

《对话》说“罗瑞卿没露面”，这倒没有错，但没有参加会，何以“罗瑞卿自己也可以辩解”？其实，《回忆录》所述是准确的：“小组会议只传达过‘长子’两点意见”而且“这样的传达也只有一次”。

上海会议其实是由知情者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揭发，使与会者了解罗的错误及其严重性，会后先行免去罗瑞卿的军内职务。怎能如《对话》所称刘少奇说这次会议“用谈心的方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与谁谈心？如何谈心？

《对话》称刘少奇说，“回北京后，中央军委还要开会”也是错的，回到北京后于1966年3月至4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是中央召集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不是由中央军委召集的，《回忆录》所述“中央还要继续开会”是准确的。

### 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与京西宾馆会议

○ 父：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

196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罗”，邓小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为此专门召开的“批罗”会议开始，他指定叶剑英为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与肖华、杨成武等人一起领导“批罗”。那天，邓小平以不愉快的口吻说：“会议怎么开？按照刘主席在上海讲的办。”说罢他就走了，再也没参加会。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

子：这次会议的与上海会议有什么不同呢？

父：起初四十几个人，**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九十几个人吧。会议是“三有”了，有文件，有记录，有简报，罗瑞卿到场“面对面”地批判。大家发言很激烈，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林彪得知后立刻指示，**所谈问题不许超过罗这条界线，于是就没人再提贺了。**-----《对话》上，页14-15

◎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继上海会议之后，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称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开罗瑞卿的会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邓小平、彭真他们牵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时间进行了一月有余，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约有两周时间，主要是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领导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罗本人也参加了会议；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人，除军队参加上海会议的全部人员之外，**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总共有近百人参加会议。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组织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记得总书记邓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对会议怎样开，上海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说了。另外，我提议成立一个会议领导小组，具体领导会议的进行。”接着邓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

**邓、彭也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作检讨。**

……

因为林总有话在先，叶剑英说服了大家，**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回忆录》上，页398-399

1、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65年12月29日-1966年1月18日）是总政为贯彻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而召开的。在中央还没有统一口径，统一部署的情势下，会议断不可能如《对话》所说“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相反，正如以后（1967年9月）斗争萧华时所“揭发”，萧华在这次全军政工会议上说，“不要搞什么揭盖子，包括罗瑞卿同志在内”，“不

要去找小罗瑞卿”，“不要追究责任”。（总政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筹备处：《斗争萧华会议纪要》，1967年9月）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更没有使“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罗瑞卿问题传达到全党全军，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及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之后。

2、《回忆录》指出，邓小平在批罗时起码做了三件事：一是由邓与彭真牵头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二是“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苏振华组成领导小组并由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三是“多次找罗谈话，邓小平叫他从‘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五个方面检讨”。并不是如《对话》所称“对毛主席交办的事敢于公开甩手，邓小平有这个胆量”。毛在世时，邓从来没有“敢于公开甩手”的“胆量”。

3、京西宾馆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二阶段增加的人员是《回忆录》所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及“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并不是如《对话》所言“后来增加了一些军兵种首长参加”。

4、关于贺龙的问题，京西宾馆会议根本没有丝毫触及。《回忆录》所述是对的，“整个会议没有直接涉及贺龙的问题”；《对话》声称“许多人还揭发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完全错误。

## 八、新疆战略勘察

（本节应作者要求删略）

## 十一、求救信

○ 父：你走了以后，我想了想，决心向上写信，我想用笔写，但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了。我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趴在地上写了一张纸，大意是，“本月十七日，我被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关起来之后，每天都要对我进行武斗。前天下午，今天（24日）上午，公开进行了两场残酷的大武斗。我现在被打的不能动了，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又确悉，明天还有一场更残酷的武斗。我

已命在旦夕。我请求救我出来，只要生命能存，我就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写好了已是下午2时，我着急怎样才能把这封信送出去。

子：我离开你那不久，一个被造反派叫去协助看押你的警卫员小蒋来了，他偷偷带出了你那封简短的信，我们赶紧打电话联系。在天刚刚黑的时候，林彪办公室派车来人把信拿走了。-----《对话》上，页99

◎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回忆录》下，页507-508

1967年1月邱会作被批斗时写求救信，《对话》及《回忆录》均有提及，但细节上有较大出入。《对话》是先电话求救再写求救信，《回忆录》是先有求救信再电话求救。笔者相信《回忆录》的真确性，所以将写求救信一事的分析放在前面。

《对话》称邱由于“手臂的筋受伤握不住笔”，所以“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写信（但《对话》的求救信中又称“只有左手还勉强能写字”），用嘴咬着笔如何能写字？而且在被监视的情形下一写就是120多字。此外，在被监视的情形下如何能搞到笔和纸？这些，都是令人生疑的。

而《回忆录》称看管邱的恰好换了邱的警卫员蒋平安，是蒋“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邱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32个字），信写好后，由蒋在换班时带出。两相比较，《回忆录》此过程细节的可信度高于

《对话》。

## 十二、电话求救

◎ 子：那天武斗场上高音喇叭的呼喊，**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军委通信兵总机很帮忙，**第一个电话打到肖华处，办公室回答：“应当正确对待群众。”**再打到杨成武处，值班员非常重视，说“首长不在，会记录下来报告。”我们只好再向上找人，**打到林彪处，秘书回答说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叶主任（叶群）嘱咐叫你们放心。”**时间这么紧迫，再等下去就是死！我突然想起了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躲反”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妈妈立刻打电话去，**黄永胜一听就泣不成声了，说：“还电话记录什么，人都快被整死了。我这就赶去林总那，你们设法叫老邱坚持住。”**-----《对话》上，页98-99

◎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她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

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回忆录》下，页508

据胡敏老人讲，1967年1月24日批斗邱会作时，程光并不在其身边。既然不在现场，那么，《对话》中上述有关电话求救的具体情节，可以说，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杜撰的。

比如，《对话》称：“藏在附近的妈妈她泪流满面几次要冲到会场，说是要死就死的一起，被我们拼命拦住”。据当时在场的当事人称，这样的情节并不存在。如《回忆录》所述，“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但并没有“几次要冲到会场”又“被我们拦住”。胡敏要是冲到会场被抓，连打电话求救的机会也没有了。

既然程光不在现场，“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求援”就不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据《回忆录》，胡敏打电话的顺序是杨成武处、叶剑英处、黄永胜处及林彪处，并没有如《对话》所说给萧华打电话。打到杨成武处，赵志珍（杨的夫人，也相当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接了电话给推了”。打到叶剑英处（《对话》未提及打给叶，叶是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平时对邱甚为关心，邱回总后前又是到叶处道别，不向叶求救，不可思议），未找到叶。打到黄永胜处（这也并非程光“突然想起”的），黄称“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但并没有如《对话》所说“泣不成声”。一个战火中锤炼了几十年的战将，听后愤怒倒符合实情。给林办打通了电话，秘书郭连凯只是安慰胡敏不要着急，并没有说什么“首长有交待”，“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等等。邱会作还没有求救之前，林彪何以知道邱会作的困境？何以交代“对邱部长要保护，要注意动向”？胡敏最后这个电话及邱的“求救信”是最有效的，促使林彪采取了保邱行动。

### 十三、叶剑英派人接邱到西山

○ 子：我记得25日当天晚8时，叶剑英派人到翠微路招待所接我们回西山。**我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车子停在我们的住处时，叶剑英、聂荣

臻、肖华夫妇、黄永胜等人早在门口等候了。叶帅急忙走上几步俯身朝担架上看你，扶住你想起来的身子，叫你不要动。

父：我心里难受呀，像受了委屈的人见了兄长一样放声大哭，哇哇地哭了。叶帅忍不住也哭了起来，在场的人全放声哭了。

子：我记得，聂帅噙着眼泪大声说：“法西斯！法西斯！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

父：我深深感谢老首长和老战友对我的安慰。

第二天，刘伯承元帅来看我，他眼力不行了，就用手摸我，把我从头摸到脚。当他的手触到我的伤处，我本能地反应，我颤抖，他的手也在颤抖，立刻把手放轻。刘帅流泪了，说：这是个啥子文化大革命哟！明明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总察觉到了问题，派人去救你，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全体老干部的关心。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

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减轻痛苦，刘帅讲起了长征中我这个军委机关里年青的科长和他这个顶头上司、红军参谋长每日在一起行军、工作的往事。但是说着说着，又说回了文化大革命，一贯待人厚道的刘帅连声不断地骂起了造反派。——《对话》上，页100-101

◎ 晚上，叶副主席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杜海舟科长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们的车还没有到，叶副主席、聂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由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伤势过重，不敢拉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骂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这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二十六日下午，刘伯承副主席、汪大姐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和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势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觉到了问题，断然派人去抢救你。这既是对你的关心，也是对部队干部的关心。”接着，肖华、刘志坚、黄永胜、陈锡联和正在叶副主席处开会的各军区、各军兵

种首长都来看我了。-----《回忆录》下，页510

据了解，邱会作被叶群接出来后，是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的夫人把胡敏和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接到翠微路邱会作处，后又由杨成武的王副官和邱路光到总后把警卫员蒋平安接出来，并一起上西山。程光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能“看到沿路重兵戒严，防止造反派抢人”。《回忆录》说“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并不是如《对话》所说邱会作、叶剑英、聂荣臻都哭了。

《对话》中聂荣臻所说：“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抓几个不行！”刘伯承所说“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这些话，以及刘伯承讲长征的事、骂造反派，在《回忆录》中都是没有的，《对话》中的这些话，都有臆造之嫌。道理很简单：如刘伯承，对军外之事所知甚少，对造反派没有感性认识，为人又十分谨慎，他明知毛泽东支持造反，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刘伯承是不会骂造反派的。

这样看来，《对话》总说些过头话，安在某些重要人物身上。要知道，“过犹不及”，说话一过了头，就不真实。

#### 十四、军委八条

◎ 子：为了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访问了不少老同志。一位当年担任一个兵种司令员的老同志说：**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

父：当时叶群就对我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我才体会到刘伯承元帅对我说的，“**你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委又颁布了一些命令，颁布了制止武斗的《布告》多次，根据部队在执行中的偏差，或紧或松做过些调整，但基础的都是《军委八条命令》。-----《对话》上，页107

◎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年一月

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忆录》上，页456

据切实了解，《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时，邱会作刚到西山三天（邱1月25日被接到西山），还在疗伤，卧床不起。他对《军委八条》的形成过程并不太了解，所以，在《回忆录》中说得很简略，更没有可能认为《军委八条》是因自己遭遇而引发，将自己的作用看得那么重要。《对话》称叶群对邱说，“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应非事实，因此期间叶群并没有来看过邱会作，只是打过一次简单的问候电话。

《对话》称“那个《八条命令》好哇！它可是用赵尔陆的命和你父亲的半条命换来的！”这也是明显的杜撰。《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颁布，而赵尔陆是67年2月2日凌晨去世的，即《军委八条》颁布在前，赵尔陆去世在后，仅因果关系就不符合事实。

同时，《对话》称刘伯承说“你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亦非事实。据当时在场的邱会作警卫员蒋平安回忆，刘看望邱时没有说这样的话。

## 十六、周恩来对邱会作的评价

◎ 子：那篇讲话在军内外反响很大、广泛流传。但是“九一三”后，**对这篇讲话又收缴销毁。周恩来这么重要的一个讲话居然在文献资料中没有了踪影**，好在还有人收藏着它，否则今天就看不到了。

父：周恩来说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形势后说，“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经住了这次考验”。这句话把我说得面红耳赤。我的地位比周总理不知道低多少，怎么能被他称作“战友”呢？

子：他在讲话中说：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我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所以

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周恩来点名道姓地点评了军队历任总后勤部长后，说你“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很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对话》上，页127-128

◎……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讲话。总理说：

……

“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就参加了后方的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老战士。……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回忆录》下，页515-516

周恩来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文革期间收集在群众组织所编印的各种“中央首长讲话集”中，流传颇广。“九一三”后，此类文革资料大都没有如《对话》所说被官方“收缴销毁”（即便《林彪文选》之类有关林彪题材的资料，官方也没有强令收缴过），民间中收藏如恒河沙数。如笔者手中，周的这次讲话，就有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4月编的《中央首长讲话》等数个版本。

《回忆录》所引用的上述周恩来讲法，比较全，原汁原味，估计也是摘录自

群众组织编印的类似“首长讲话集”。惟《对话》引用的周的讲话，就不是那么“原汁原味”，如《回忆录》中有一句“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对话》中变成“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把“林彪同志”去掉了。《回忆录》中另一句“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对话》中也变成了“跟着毛主席走”，把“林彪副主席”抹去了。我们对比后发现，《对话》中引用的这一段话，是一字不差地抄录自2010年落成的邱会作陵墓里的石刻《人民总理周恩来的评价》（该石刻照片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995）。而陵墓中石刻的文字，并不是周恩来讲话的原文，而是经邱会作家人压缩、调整过的。石刻中两处将“林彪同志”和“林彪副主席”删去，是邱会作家人为了顺利下葬，采纳了当地领导的意见的妥协性结果。

《对话》引用邱会作去世多年后由于客观因素作了删减的周恩来讲话这段文字，反倒成为邱会作生前并没有作过这样的父子对话的有力佐证。

## 十七、“五一三”事件

◎ 父：对军委机关里发生这些新的情况，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原想就这么拖着，让事态再扩大一些，让造反派闹得再厉害一些，问题反倒好处理了。如同当年向毛主席争取《军委八条命令》时那样。

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

**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

子：5月13日晚，以海军为主的驻京军队机关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进行文艺演出，和造反派发生了冲突。

父：军队文工团里小知识分子成堆，平日纪律也差，成了造反派“打、砸、抢”的主力军，**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能组织一次演出是在显示力量。

……

父：此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5月16日，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去海

军、空军总医院慰问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冲突中被打伤的人，《解放军报》作了报导。从此各单位纷纷揭露造反派的罪行。我记得好像是在6月中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汇报演出，林彪、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全体成员、在京的党、政、军领导出席观看，肖华和全军文革的头面人物没有参加。这一天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

子：我查阅当年的报纸，大会堂演出是6月9日，肖华没有出席。可是8月1日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新华社的新闻中有肖华出席，还提到全军文革。

父：那恐怕是最后一次吧。没有几天，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全军文革几位骨干成员因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委领导机关而被审查了。-----《对话》上，页135-136

○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什么机会呢？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导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

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叶群的话等于林总已经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总后没有文工团，因此“五一三”没有参加进来。但我的态度和他们是同样的。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示弱，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冈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武斗一触即发，这一派以后被称之为“冲派”。

萧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现在看来，也不能说萧华就是错，但林总的决心是军队不能存在造反派！萧华抓了芝麻，林彪要的是西瓜。

.....

当时，毛主席还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是相信造反派有力量的。展览馆“激战”时，刘淑媛在毛主席处，她告诉主席说革命派胜利了，主席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毛主席是支持刘素媛的，幸好刘素媛是个革命派，是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

-----《回忆录》下，页 527-529

关于“五一三”事件，《对话》与《回忆录》细节不同处在于：

1、《对话》说，“林彪可以这样耐心地‘等’，但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压力就大了，他急呀。从我和周恩来的接触中感到，毛主席也不想让军队再发生什么乱。他要求军队，特别是领导机关尽快稳定，以利完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既然他们三个人对结束军队这种状态看法一致，那就是找个事由作为契机吧。”言下之意，《对话》认为“五一三”是毛、林、周共同找的“契机”。而《回忆录》强调的是林彪的作用，“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他支持刘素媛可以被林彪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林彪支持革

命派的确是一步险棋”，而周恩来在“五一三”事件过程中其实是有点后知后觉的，总之，“五一三”并不是毛、林、周三人通过气所致。

2、《回忆录》强调了空政文工团刘素媛在整个“五一三”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可以说，没有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没有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以示支持，就没有“五一三”。惟《对话》则对刘只字没提。

3、“五一三”当晚参加演出的“驻京陆海空三军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余注：实为“保守派”，也即邱会作所称的“革命派）群众战斗组织有：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红色造反舰队，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第二炮兵星火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北京军区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八一”体工队红旗革命造反派，空军体工队革命造反派，北京军区体工队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他们号称为“驻京陆海空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亦即《回忆录》所说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等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的共同演出，与《对话》所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概念有所不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五一三”事件后才形成的，它所涵盖的范畴比“三军文艺团体革命派”要广得多。

4、1967年6月9日，林彪、周恩来等在京观看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不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队”）的联合演出。此前，《解放军报》从未报导过有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任何消息。这一天并不“等于透露出全军文革、肖华有问题了”。肖华此后出席过多次公开活动，如6月20日欢送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7月25日首都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百万人大会，7月31日晚国防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招待会，8月2日欢迎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归来大会等，新华社都有公开报导。同时，研究界至今未曾见过任何“中央就研究了肖华的问题”的有关材料。

## 二十一、杨成武问题

◎ 父：……我曾想，中央可能会把杨成武放一段时间再说。不料当日深夜，中央碰头会在人民大会堂就讨论了杨成武的问题，我列席了。周恩来决定由副总长王新亭和李作鹏把杨成武从家中弄出来，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

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行动前，王新亭有些唯唯诺诺。周恩来叹了口气，环视一周，把目光落在我这说：“王新亭办事不泼辣，会作，你对杨成武家熟悉，那里文件很多，你心又细，你也去。”我心里明白，周恩来这样是做给江青看的。

我们到杨的住宅时，中央警卫团一个中队包围控制了院子，原来警卫部队已被缴械撤出。

子：那天随同你去的警卫员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除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那的工作人员发现后，以为中央要清算“老机会主义分子”了，急忙批判除帅，叫他交办公室的钥匙。杨成武那么“红”，谁会想到他要下台呀！

父：我们进了院子直接上了杨成武宿舍的二楼，进到他的卧室兼。几日不见杨成武，他的胡子、头发又长又白，没像平日一样修饰，显得苍老多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杨成武凄凉地问：“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李作鹏说：“总理请你去大会堂开会。”杨成武坐着，头向下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至少有五分钟没人说话。突然他抬起头来，悲怆地说：“老邱，你要讲良心呀！”我想，若是吴法宪来带杨成武走，他不会生疑，可是这么亲近的人来了，他没有想到。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心中想：老杨呀，你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的，我是一个对得起朋友的人。

一会儿，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要进来带人。在门开启时，我听到了外面杨成武的爱人和孩子们那儿发出的凄惨声。……

我们下楼时，杨成武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警卫团的战士排成“人墙”隔成了通道，让我们直接出去。杨成武的二女儿突然站在“人墙”背后的橙子上说：“爸爸你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说罢唱起了国际歌。我示意制止了想对她动手的警卫团战士。-----《对话》上，页177-178

◎ 三月二十三日晚中央碰头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专门讨论处理杨成武的问题。我和李作鹏列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一）先把杨成武从他家搞出来；（二）在中等城市安置，对外保密；家属由总参管理，不准受歧视。这些事都布置好了之后，周总理决定把杨成武搞

到大会堂来，他先派王新亭带中央警卫团的人去把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掉，把杨的家全部控制起来，杨成武家原来是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的。王新亭和杨成武的关系不错，可以说他平时对杨毕恭毕敬，此时他有些唯唯诺诺，表示很为难的样子。总理看了王新亭一眼，叹了一口气对着王说：“你怎么搞的？”我同李作鹏离总理不远，我们靠在柱子上闲谈，总理看到我立即招手把我叫过去，总理对我说：

**“你们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你过去和杨成武关系融洽，就说我让他到大会堂来开会。让他（指王新亭）先把警卫部队换掉，你去带杨成武。”**我跟杨成武关系很好，我同样也有些为难，我对总理说：“我叫他，他能来吗？他都‘歇工’一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你领来。”总理看了我一眼说：“你去吧，就说我通知他到大会堂开会。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我只好从命了。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他报告总理说，“杨成武那里有大量的机密资料，要搞丢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总理：“对呀。”他想了一下对李作鹏说：“你也去，要**负责保护杨成武不发生意外，也要保护文件，先封存，现在就去办理。”**

.....

杨成武坐在一个长沙发上，头向下低得几乎要同膝盖相连了。至少有五分钟以上，我们互相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杨住的房子是元帅宿舍，质量非常好，只要不开门，外面的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静静的房子里好像空气一点都不流通，杨成武一直没有说话，但突然拿起电话要打，**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他把电话一摔，杨成武突然大声说了一句：“你邱会作对我也要有良心呀！”

此时，我和李作鹏坐在那里都没有说话，对杨成武说的那句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心想，今天真是不该来。**过去，杨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个人关系的确是挺好的，对他的问题，我应当不沾边就好了。我当即暗下决心，今后对杨的问题，在自己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一定做好一点，以向他表示我邱会作是对得起他的！

王新亭把杨成武的全部家属：母亲、妻子、儿女等都集中在楼下会客厅里后，就来通知我们。临走之前，杨要去看一下家属，我们同警卫团的一个副团长商量之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杨离开家的时候，他的二女儿在家属群中站在一个凳子上，大声地向她爸爸说：“爸爸！你要吃好饭、睡好觉，不要惦记我们。家里的事，

我们可以管好的。”杨成武的二女儿，很泼辣，很坚强，我看到之后，甚为感动！-----《回忆录》下，页556-558

关于安排将杨成武带到人大会议的过程，《对话》与《回忆录》有如下细节的差异：

1、《回忆录》说，周恩来先派王新亭（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去，王“有些唯唯诺诺”，表现很为难的样子，周再叫邱会作与王新亭“你们两个去”，王的任务是“先把警卫部队换掉”，邱的任务是“你去带杨成武”，最后，周听李作鹏说到文件问题，叫李“你也去，……”。

而《对话》则称周是先要王新亭、李作鹏去，且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王有些唯唯诺诺，周再叫邱一起去。《对话》不合理处在于如周是先要王、李去，王表现有畏难情绪，但李并没有畏难，为何周再叫邱去呢？且王的任务就是换警卫部队，何必又叫汪“指挥中央警卫团解决杨成武家驻守的卫戍区部队”？“换掉”的含义与“解决”不同，“解决”就有处理之意，能将卫戍区的部队处理掉吗？

2、《对话》前面说“中央警卫团剪电话线时，误剪了相邻的徐向前元帅住处的线路”（实际上无此事），《回忆录》中说“电话早被王新亭他们掐了”，即杨成武家的电话线剪了，应是事实。《对话》又说“中央警卫团领头的副团长进来说，‘总理打电话催了’”，电话线剪了，总理怎能打通电话，前后有矛盾。

3、《对话》中说“我也难过极了，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我想对杨成武说，我被当成了你的同党，还要打倒我呢！但忍住了”。

在68年那样的时期，“杨余傅”事件是重大事件，总理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邱会作，显然是对邱会作的信任，邱会作应当也会有这样的认识，何况“这时李作鹏也凑过来”，因此邱会作心里当不会“心里抱怨周恩来给我派这个‘鬼差使’”。另外，江青想把邱会作化为杨成武同党整治，是在解决了杨成武问题后，清理杨成武的人脉时，提到了邱会作，而不是在之前。如果去抓杨成武之前，邱会作已有杨成武同党“之嫌”，智慧老道的周恩来怎么会派邱会作去抓杨成武呢？

## 二十四、黄永胜不当常委

○ 子：我注意到了，参与中央“组阁”的三个人中，只有黄永胜不是政治局常委。

父：黄永胜说：他进常委，总理、康生都建议，主席也同意。政治局常委原定是七人，毛、林、周、陈、康、他、张春桥。主席对张春桥犹豫，觉得他进常委会，反对的人多，不利于党的团结。**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主席同意了林总的意见。**

子：黄永胜说的是，**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父：就是这个意思。再说，黄永胜也谨慎谦让，那么多老资格都没进嘛。-----

《对话》上，页260

○ 邱：“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爽快地说：“那么多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回忆录》下，页650

黄永胜不当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据《回忆录》叙述，是黄永胜本人推掉的，而《对话》说是林彪提出的。

我们前头已经说过，在文革中，对于中央的负责人，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做出表态。在毛泽东未有明确态度之前，说“还是林总揣摩出了主席的心思，提出来，我和张春桥都暂时不进常委会”，有违林彪之性格。

笔者为此曾询之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据其称：当年听我父亲说，他推掉进常委的候选人，是他自己的决定，与林彪无关，更不是程光所说“林彪以牺牲他来阻挡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顺便指出，在《对话》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的中共领袖人物毛、林、周“密切”关系的表述，也有大量邱会作与当时中央重要人物如叶剑英、叶群、汪东兴等人“密切”关系的表述，从而使读者初读《对话》，有窥见中共高层秘密的感觉。然而，从当时邱会作的地位、以及文革中严峻的政治环境来说，这种关

系（透露“尖端”消息、交流心里话、无时无刻不诋毁江青等）都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反倒是《对话》最大的失实之处。

## 二十五、江、叶进政治局的影响

◎父：起用江青，成了毛主席说不清楚的问题了。你说他“不同意”，好像是。可是你说他要是真不同意，江青又怎么能进得了政治局呢？！

子：官方的材料说：由于“林彪与江青相勾结”，江青等人才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借此权力进行了大量“反革命”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父：那是不顾历史事实胡说！这事又不是没有证据，筹划一中全会的原始材料都在国家档案里！可以公布嘛，如果暂时不便公布，也不要乱编假话骗人嘛。

对此，我到是有几点看法：第一、江青进入政治局，责任在毛主席。**第二、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第三、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什么大事。如果想靠老婆作什么事，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我就说不出来什么了，它成了毛泽东说不清楚的问题。——《对话》上，页261**

◎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对党的团结不利，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尤其对老同志来说，主席的威望相当有损。

那么，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作何解释比较符合历史情况？虽然在组成政治局的过程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三人小组，自始至终都是建议江青进入政治局的，但这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主席，不管毛主席愿意不愿意，没有毛主席的点头，江青是绝对进不了政治局的。**但是有人认为，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至于叶群进入政治局，无须多说，她是江青进入政治局的“陪衬”。江青不进入政治局，叶群连边也沾不上。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当然，这个责任在主席，

总理也很迁就主席，林彪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回忆录》下，页658

文革前期，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而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故而，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一开始就将江青这枚棋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尔后，江青是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江青进入政治局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1969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政治地位高于邱会作，邱进政治局就合理，江青进入政治局就值得非议，这个道理似不通。笔者认为：

1、江青进政治局，是文革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政治上的需要。《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因为个人因素把江青塞进政治局，这也不对。毛主席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点头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主席对今后政治格局的考虑。”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而《对话》含混地借邱会作的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主席不是为了依仗她重用她，江青在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大忙，毛主席也没想依靠她办人什么大事”，甚至说出“他那么作是不是对调节他们的家庭关系有所考虑”这样没有政治水平的話，这与《回忆录》中的邱会作俨然判若两人，显然，《对话》中的邱会作的话是其作者自己杜撰而安在邱会作头上的。

2、“政治问题”与“政治影响”是相互相承的，《对话》说，“江青进入政治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没造成重大的政治问题”，其实，政治问题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政治影响就是政治问题。还是《回忆录》说得对，“江青、叶群进入政治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谋私利，但九次大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老婆都同时进入了政治局就是大问题了。”

## 二十八、李必达事件

◎ 父：……

李必达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入伍后在基层部队，该部队领导是黄永胜原来的老秘书，把他推荐调到了军区司令部，审查和看了一段时间后给黄永胜当秘书。  
**李必达受到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温玉成的喜爱和器重。**

子：1968年初，温玉成调入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不久前刚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父：林彪察觉杨成武与中央文革关系过于密切，有些多少带有防范性的考虑，其中之一是把温玉成调到北京任职。当然，温玉成离开广州还另有原因，他在那的“人缘”不很好。黄永胜向林彪建议把温玉成调到北京，换个环境。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而温玉成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实权人物。温玉成能有如此进步，与黄永胜的提携分不开。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

从红军时期开始，林彪麾下有一批战将和骨干。全国解放以后，刘亚楼、赖传珠相继病逝，邓华、肖华、杨成武等人先后垮了，林彪和黄永胜的关系就突出了。在林彪的意图之下，黄永胜同吴法宪、汪东兴，加上后来的李作鹏和我，形成了抗衡江青的力量。温玉成早就知道这个秘密，认为江青在中央里有特殊权力，反对她无异于在“玩火”，便与黄貌合神离。而江青则有意扶植温玉成，以便她在解放军里有人，这引起了黄永胜对江青的厌恶。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

……

父：……

我们议论他们，外人听不见，即使偶尔听到一两句也不明白。可是李必达有意在听，还偷听黄永胜打电话。后来我查看了收缴李必达的几大本记录发现，……这些李必达都记了下来，他不仅想以此当“政治把柄”要挟黄永胜，还要扯进汪东兴等人，胃口可算大了。

……

父：……

“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属于绝对机密。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李必达把揭发材料送到了钓鱼台十一楼江青那。

……

父：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

4月27日凌晨，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没有找到，偶然发现他向江青写了信送了揭发材料，……

……

父：……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

子：但是温玉成并没有得到原谅，被贬出了北京。

父：你可不知道，进了一个事非圈子，想出去就难了。温玉成能够揭发江青，知道错了，林彪也豁达大度，决定免去他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

子：既然豁达大度了，又何必如此？

父：因为江青说了几次，要整温玉成。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心灵的对话》上，页395-401。

◎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黄永胜骂

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过去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齷齪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一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四月二十五、六日，凌晨三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

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邓会作回忆录》下，页 587-590

关于李必达的问题，细读《回忆录》和《对话》不难看出，两本书出入很大。当年处理此事的黄永胜办公室秘书张辉灿和当事人警卫参谋李学金表示，《回忆录》记述得“很准确”，而《对话》是严重失实的。

1、李必达 1965 年分配到广州军区，当时温玉成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不是参谋长（温 1960 年 5 月已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4 年 8 月前兼军区参谋长）。

2，温玉成 1967 年 11 月调任副总长，并非 1968 年初。主要原因是当时副总长五人中大半已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已靠边站而非其他。

3、《对话》中说“李必达随黄永胜到了北京，当机要秘书，时常与温玉成往来”，“可黄永胜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李必达倾心于温玉成，成了窥视他的‘坐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李必达和温玉成没有私下的个人来往，更不是“坐探”。

4、李必达并没有“几大本记录”，此事也没有“扯进汪东兴等人”。

5，最关键的是李必达揭发黄永胜的动机。李必达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大部分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引起李必达的不满。同时，在文革中李必达也有想出人头地当大英雄的念头。揭发总参谋长黄永胜和副统帅夫人叶群骂江青无疑是最大的革命行为，他肯定能当“大英雄”。报复和想当英雄、一鸣惊人李必达给江青写告状信的目的。《对话》中说，李必达写告状信的目的是因为“‘九大’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阁’，李必达从黄永胜的文件中发现，碰头会成员都进入了政治局，唯独排除了温玉成，李必达向温泄露了机密，说想揭发黄永胜，没有受到温的批评和反对，这纯粹属于编造了。李必

达揭发黄永胜都是反江青的事，跟政治局组阁有没有温玉成毫无关系。第一、当时李必达根本不在黄办，而在北京针织总厂为黄永胜盯班。第二、三人小组研究工作在中南海，任何人不能接近。第三、就是有文件送到黄的住处，都是中办机要局专人送亲启件，黄本人看后，签署意见，亲自封好，由中办机要局专人带走。李必达就是在也根本沾不上边。

6、《对话》中说“温玉成害黄永胜还说不到，他只是想借江青的帮助进政治局”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7、温玉成问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李必达的问题，他调动是他因他得罪了江青。李必达在九大一结束就抓起来处理了，而温玉成九大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一年多以后，1970年6月份才到成都军区。在处理温玉成的问题时，江青坚决要打倒温玉成，是林彪保了下来，决定调出北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但并非是为留下什么“活证据”），在文革时期，这就算命大了。《对话》中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温知道内情后，骂江青是事实，但根本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材料。那个时候，江青不仅是毛主席夫人，也是政治局委员，是不可一世的，怎么敢让温玉成在办事组“作报告”式的骂江青还录音？！

8、另外，李必达揭发的主要是黄永胜、叶群、吴法宪反江青的言行。那时李作鹏和邱会作还没有更多参加进来。《回忆录》（下册页581）中说“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对话》提前把邱会作放进反江青的斗争，旨在抬高邱会作。

## 三十二、对汪东兴的评价

◎父：……

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东

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于警卫工作熟悉，也比较肯干，称职。从文化大革命酝酿发起时开始，汪东兴地位直线上升，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羞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对话》上，页434-435

◎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回忆录》上，页690-691

同一个邱会作，《对话》与《回忆录》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1、《对话》说“康生评价汪东兴只是个‘警卫员’，如果去掉羞辱的意思，倒也切实中肯”；而《回忆录》中邱会作本人则说“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笔者认为，后者说得中肯。汪还是有能力的，不然在毛泽东身边能呆得那么久？在抓捕“四人帮”时，汪东兴作为主谋之一，在政治上识大体，在部署上严密周到，没有一点能力，何以能做得那么漂亮？

2、《对话》说“我和汪东兴认识的比较早，在延安他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时就认识”。汪1947年才到毛处工作，其时邱在东北，这个时期邱与汪能碰得上面？《回忆录》则说对汪“也不很了解”，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3、《对话》说汪“特别是参加了中央碰头会以后，喜欢向人显示自己很有思想水平和能力”，笔者认为，这是《对话》对汪情绪化的描述。邱会作当时不是中央碰头会成员，与汪接触机会也不多，何以得知汪的“显示”？

### 三十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

○ 父: ……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讲话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对宪法的评价，后面说的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子：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如果林彪乱讲胡说，公布了讲话记录岂不是抓他一个正着。但是没那样，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他对宪法修改稿评价较高。

父：林彪讲话的时候，毛主席在听得很认真，听着林彪对宪法草案的评价，不时露出笑容。

林彪在讲话后半部分，说到对毛主席关于“天才”的评价，批评了某些人。

子：林彪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的同志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毛主席）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对话》上，页437-438

○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回忆录》下，页 692-694

《对话》说，“林彪那次讲话录音，不知为何，一直不肯公布”，“即使在‘批林’的高潮中也没有那么作。我们只能从资料上读到林彪讲话的节录”，此说不确。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稿原稿全文，在1972年1月中共批林时（距“九一三”不及四个月），经毛泽东指示“照发”，已以[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国。

林彪的这次讲话，正如《回忆录》所述，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而并非《对话》所称“讲话分前后两部分”云云。此外，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是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而并非《对话》所称“在讲话后半部分”。

《对话》所引林彪那一段话并不准确（《回忆录》所引的同一段话比《对话》准确些，但也有漏字漏句）。[1972]5号文的原文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种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

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的多，大的多，快的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把马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现在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

### 三十五、叶群的讲话

◎ 父：……

听完录音往回走时，叶群和我们还是上主席台从后门出去。在台上，叶群用了不小的声音说：“**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昨天晚上，总理交待张春桥，叫他准备好宪法稿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章节，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叶群的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对话》上，页443

◎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回忆录》下，页699

上述叶群的话，《对话》与《回忆录》似乎基本一致，惟《对话》中的叶群多了一句话：“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

惟这句话非同小可！

据目前所知，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从未就国家主席发表过意见。除了吴法

宪作的假交代“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沾了一点边外，当时的中央花了大半年收集证据，也没有找到叶群关于要设国家主席的只言半语。

现在好了，《对话》说叶群在庐山上说过“对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来表示无产阶级感情！”岂不是为所谓“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语）提供了证据？

### 三十六、周恩来的态度

◎ 子：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他有很明确的态度吗？

父：听录音那天中午之前，周恩来把我找去了，谈了些工作业务上的事。全会期间，国家日常工作从北京报到庐山由周恩来组织处理。中午，我们两人共进午餐，周恩来说：这次会议原来是个“盖橡皮图章的会议”，**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了，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对话》上，页443-444

父：周恩来对我安慰说：“不必过分忧虑，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及时打招呼。”但我还是感到问题已非常严重了。可以说，就是听到毛主席把我们指责为“军事俱乐部”，我思想上才真正有了震动。

那天，周恩来留下我谈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事，谈完后我们又说到了全会。周恩来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

子：周恩来说的这些至关重要，除了表面上的意思，还有更深的暗示吗？

父：**他提醒我们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

《对话》上，页464

○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回忆录》下，页710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回忆录》下，页713

周恩来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也是一个很圆熟的人。上述《对话》中所谓周的一些话，现实中的周是绝对不会说的。《回忆录》中也没有类似的话。

1、《对话》说周在庐山听完林彪讲话录音后说，这次会议“很可能会有些思想斗争，解决一个‘大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敢怒不敢言”的问题，指的恐怕就是张春桥问题。惟根据现有材料，周恩来在庐山上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涉及张春桥的问题。另据跟邱会作上山的秘书刘作山说，邱会作在庐山上也未曾与周两人单独共进过午餐。

2、《对话》称，周恩来在毛泽东翻了脸后，还对邱说“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再处理。”毛翻脸以后，站在江青、张春桥一边，矛头对着陈伯达，并追查吴李邱，实则是对着林彪，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怎么还会把“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放在嘴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此外，“军事俱乐部”一说，是康生讲的（见《回忆录》下，页711），不是毛泽东说的。

3、据《回忆录》，周恩来在庐山期间从来没有提醒过黄吴李邱要和陈伯达尽快分开，同时亦没有表示过他准备保吴法宪。周恩来仅说过“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回忆录》下，页715）要吴写检讨以过关是明智的，而公开声言“表示他准备保吴法宪”是不明智的，周才不会那么傻。

关于周恩来是否表示过要保吴法宪，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得更清楚。8月28日，周对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吴于是表示：“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周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05-806）

如此说来，周的“圆熟”还表现在他要吴检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吴是否能过关，而是一要替“副统帅”担责任，二要替“我”（即周自己）担责任。陈伯达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分量是不足的，否则毛泽东不会拿并无大错（至少不如汪东兴）的陈伯达开刀。

### 三十七、吴法宪写检讨

○ 父：可是我们几个人思想有分歧，黄永胜认为他对庐山上的事“沾边不多”，若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找他“岔子”，他不理睬，必要时反驳。

……

父：吴法宪有不少“辫子”在上海帮手里抓着，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打倒就不错了，有些心虚害怕。

我和李作鹏对黄、吴的想法都不同意，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毛主席要政治局开民主生活会，目的是加强中央的团结，

把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下去。对此我们即使不理解，也要顺应。……

**黄永胜听进了我和李作鹏的意见，吴法宪也认为一味害怕没有用。我们的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

……

父：**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这是在庐山上我们建议他向毛主席“负荆请罪”的延续，也是受到汪东兴检讨“过关”启发而来的。

……

父：……

**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此前，他几次找毛主席谈，但没有回音，其实就是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谈。现在是个机会，要写个检讨。

……

父：汪东兴检讨了，毛主席批示在政治局传阅，吴法宪在庐山上和汪东兴是一样活跃的人物，他就不得不写了。

**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他写之前没有和大家商量，写好了也没给大家看。报告于9月底呈上去，好多天没有消息。**在北戴河的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同样没和我们商量。叶群这个“聪明人”又做了一件蠢事。-----《对话》下，页495-499

◎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给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大意）：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副帅认为这样很好，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我和李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

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九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他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回忆录》下，页733

1、同是邱会作，《对话》里的邱会作评价九届二中全会时“认为庐山上我们不是打错了人，而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而《回忆录》中的邱会作对此是不会赞同的。《回忆录》说，“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彪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回忆录》下，页724）。九届二中全会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对张春桥（即对江青一伙人）的态度，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并不是“办了件不合时宜的蠢事”。正如邱会作所说“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仅四两”，毛泽东是提起来还是放下来是关键。从文革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庐山会议，直到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都不是不合时宜，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

2、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9、10月间黄吴叶李邱尤其是吴法宪是否需要检讨一事，《对话》与《回忆录》是截然相反的。《对话》多处提及，“我们思想基本统一了，在民主生活会上好好作检讨”，“我们动员吴法宪主动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于是，我们建议吴法宪也向毛主席写个检讨”，“我们要求吴法宪要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而《回忆录》则称，“黄永胜坚决不检讨”，“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李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回忆录》里说，吴法宪其实是背着军委办事组的黄叶李邱向毛泽东写了检讨，“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回忆录》是言之有理的。在1970年9、10月间，毛对军委办事组检讨一事表面并没有催促，甚至说过“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

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也不会建议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去检讨。一旦吴法宪检讨，就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推到非常被动的“何去何从”的地步，黄李邱等人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3、《回忆录》是说吴法宪“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叶随后才向毛写了检讨。《对话》是说吴的报告呈上去之后，好多天没有消息，叶群着急了，“为了提醒毛主席对吴法宪的报告注意并批示解放他，也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吴写的报告吴自己着急才对，叶群为他着什么急？关于叶群写检讨报告的起因，也是《回忆录》言之有理。

### 三十八、汪东兴的要害问题

○ 子：汪东兴的要害问题在哪儿？

父：是他和林彪的关系。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他侍奉在毛主席身边，把许多内情说过去。这一点汪东兴在检讨中没有向毛主席露一丝一毫。还有，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我知道这方面的事，就是亲耳听汪东兴说的，听他说过很多呀。从汪东兴的工作性质和职责来说，至少他那么做很不道德。对于他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汪东兴在检讨中一点边也没沾。汪东兴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毛泽东绝对“忠诚”。-----《对话》下，页497

应当说，汪东兴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也是有头脑的人，仅从政治利益出发，他也会忠诚于毛泽东。汪东兴和黄吴李邱走近了，主要出在江青身上，主要是对江青的不满引起的，汪知道黄吴李邱对江青也是不满的，是敢于跟江青斗争的。据切实了解，从具体交往来说，汪东兴两次在三座门、两次在汪家里与黄吴李邱侃大山，主要是说江青的坏话，根本没有说毛泽东的不是（汪这些话，并没有直接对林彪说过，所以也不存在“汪东兴时常向林彪、叶群暗地里通消息”）如果在当时汪说毛泽东的不是，黄吴李邱也是不会答应的。《对话》说“汪东兴向外人说了毛主席和江青的不少个人隐私，包括相当多的‘生活作风’问题”，“背后议论毛主席的长短、扩散对他不利的个人隐私”，完全是编造。不论汪东

兴也好，黄吴李邱也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是绝不敢于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的。

### 三十九、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

◎ 父：周恩来找我们长谈过一次，在1971年春节后第二天，从晚上九时谈到翌日清晨。周恩来说：庐山会议的教训你们总结了不少。但最主要的是，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有人在“九大”以后多次议论我（周），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他办法是没有用的。你们对陈伯达的批判要抓紧，要写有分量的检讨，吴法宪更要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此事不能一拖再拖了。你们写的时候如有必要，我愿意帮点忙。-----《对话》下，页519

据切实了解，周恩来找黄吴李邱长谈是事实，但此际已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和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信任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毛已经开始“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这种变化，以周恩来对“中央政治”的娴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故而，此时的周对黄吴李邱应是守口如瓶（直到毛泽东南巡，周对黄吴李邱都是守口如瓶的），而绝不会在黄吴李邱面前议论江青，绝对不会说“对那个‘特别人’（江青），我的经验就是‘忍耐’，其它办法是没有用的”，更不会重提张春桥的事，说什么“对张某人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主席的批准绝对不可以行动。”

《对话》中的这些话，编造的痕迹太重。

### 四十、邱的检讨报告

◎ 父：我马上动手，认真地写了，主要写了三个问题：1、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2、结伙整人的问题。我和陈伯达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为什么我会和他搞在一起？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3、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我受陈伯达的影响，有些问题上派性大于党性了。

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对话》下，页

534

◎ 黄永胜、李作鹏和我三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关于我自己的检讨报告问题，在军委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写好了一个发言稿，准备在会上发言用的。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要我们写检讨报告的指示之后，我立即把发言稿加以修改就成检讨报告了。**我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六七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我的报告写好后，于七一年三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他转给了毛主席。-----《回忆录》下，页754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1972年批林时曾作为中央文件之一下发的邱会作检讨，完成于1971年3月21日，全文四千六百多字，并非《对话》所称“我的检讨三千多字，于1971年3月18日呈给周恩来”。

邱会作的检讨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主席亲切关怀和亲切教导下，在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教育下，在总理、康老的耐心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逐渐提高了认识”；其二为“我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交代”，主要谈了和陈伯达在庐山的两次接触和与陈伯达谈张春桥的问题；其三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的分析”；其四是“保证坚决改正错误”。

《回忆录》将检讨归纳为“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大体没有错。“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也是检讨中的原话。而《对话》将检讨归纳为三个问题并不准确，报告中没有类似“陈伯达是大骗子，骗了我，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会上宣读，成了小骗子”，“结伙整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反对原中央文革同志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余注：检讨全文完全没有提及‘中央文革’四字）”“党性和派性的关系问题（余注：检讨全文也没

有“党性”“派性”四字)”这些话。

#### 四十一、1971年“五一”毛与叶群谈话

◎ 父：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

.....

..... 那天叶群有意要单独会见一次毛主席，想好好谈一谈，再检讨一下，说点心里话。叶群见江青去吃夜餐了，立刻进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和毛主席说话。毛主席叫卫士在一边“望风”，防止别人闯到他们那。后来江青进来，毛主席和叶群已谈了一个多小时了。可以说，“五一节”那天晚上毛主席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和叶群谈话。

叶群刚进到休息室，毛主席就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叫叶群靠紧他坐在身边。

毛主席开始就说，现在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了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了结了一件事情。

叶群说，我来看看主席，也是来请主席批评的。主席两次和军委办事组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不在北京，没有当面聆听主席的教诲，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毛主席说，过去的事（庐山会议问题）都过去了，就不要再去说它了。今天谈点别的。毛主席和叶群谈了三个方面。虽然是谈“别的问题”，他又从侧面解决叶群的思想包袱。他谈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犯错误的两重性。人不能不犯错误，大的叫路线错误，对革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小的叫工作差错，一般不会造成大损失，改了就好。“吃一堑长一智”，不要怕犯错误就什么都不敢做了，一味谨小慎微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二，要注意学点党内斗争史。我们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每天同敌人斗争，同时也同自己斗争。党内斗争是绝对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正确或错误的斗争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经过几十年斗争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好经验。

第三，不要忘乎所以。毛主席说，忘乎所以是盲目性。一个人只要陷入盲目性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危险随之而来。领导干部需要有点精神，就是需要

有“热气”。但是同时也需要冷静，就是“冷气”。我们的干部缺少“热气”的人有，但很少，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是，一般都缺少“冷气”，缺少应有的冷静。我们的领导干部主要应当学会冷静地考虑问题。

子：毛泽东有谈话艺术，说教于理，但释出了善意。

父：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连忙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边，概括地介绍了谈的内容。叶群强调：“主席和我谈得很好，不仅谈笑风生，还爱和我开一点玩笑，要拉着我的手说话，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事后，我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我觉得与毛主席最近两次接见我们谈的精神是一致的，和他对我们检讨的批示也是一致的。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对话》下，页564-566

○ 七一年五月一日之夜，毛主席、林总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总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痛，早点退场。”毛主席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此时，毛主席也进休息室去了。

叶群很机灵，她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毛主席进休息室去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叶群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地同我们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回忆录》下，页778

毛主席与叶群谈话，是1971年“五一节”的晚上，这时，毛主席削弱和打击林彪的战略部署都已经完成。诸如“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华北会议，催促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直到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4月29日（“五一节”前两天）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等等，都是打击黄吴叶李邱的，虽然当时还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实质上最终的目的是削弱和打击林彪。这个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说：“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这种结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严重的了，虽然说，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我毛泽东手上，一有不慎，就不是人民内部问题了。这样的结论，

对从小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的黄吴李邱来说，肯定是致命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毛泽东跟叶群的谈话，才能明晰。

首先叶群是去探风的，不是去听“谆谆教导”的，毛主席也未必如《对话》所说“很好地安慰了叶群”。因为时隔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南巡了，对林彪使出了杀手锏，“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为首的，改也难”……。中央（实为毛泽东）给黄吴叶李邱下结论仅两天，毛和叶群这种谈话应是应付叶群的，在给黄吴叶李邱下了致命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后，还能侃侃而谈“第一……第二……第三……”是难以置信的（相反，《回忆录》中叶群只是说了一句话）。

《对话》中说“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叶群是这么幼稚的吗？“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是错误”的结论都下了，“紧箍咒”都戴上了，毛泽东对亲密战友的夫人也毫不客气。毛泽东再如《对话》中说了一堆空话，叶群能非常兴奋吗？叶群曾给邱会作赋诗一首“繁霜冷雨仍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愿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也许这才是叶群的真实心理。在这期间林立果等人活动频繁，号称小舰队。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叶群和小舰队有什么关系，但是叶群的思想不流露给林立果，林立果等人为什么要做殊死的斗争呢？叶群流露给林立果等人什么思想，绝对不会是“叶群和毛主席长谈之后出来，非常兴奋”的思想吧？

《回忆录》中叶群说，“还是和对我报告的批示差不多”，即使“没有加新的东西”，毛的批示，其实对副统帅的夫人够狠的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余注：指陈伯达）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同样，对思想较为敏锐和深刻的邱会作来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他们下的“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分量是千斤重，邱会作应该是清楚的，邱会作根本不会像《对话》所说“我对毛主席彻底了结庐山问题更加放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要

弄叶群的谈话，叶群会不会记笔记暂且不说（多半是不会），邱会作会不会“借来了叶群写的回忆笔记，反复地看，读得很仔细”，却绝无可能（《回忆录》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再仔细看，也不会捞到半根稻草，况且，毛泽东不久就在精心准备保证九届三中全会向林彪发难能胜券在握的南巡了。

#### 四十四、 张震请吃饭

◎ 父：……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派秘书请我去他那里吃饭。……

……

父：我知道他是在谢我文化大革命之初保护他过关的情份，就和你妈应邀前往。到了国防大学招待所，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相隔十几年老朋友又见面，我俩都很激动。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我环视一周，全是新人，只有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我认识，他是周总理的侄儿，是血脉与周恩来最近的眷属。周尔均以前在总后政治部当科长，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已经成为将军了。

张震开场白只有两句：“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我们俩是同年，老兄弟见面很高兴，大家好好吃顿饭。”说罢打开了他自己特意带来的茅台酒。

……

父：……宴席将散，张震问我：“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我想，大事他为难，不能办，小事又不必麻烦他，于是就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张震把周尔均叫过来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周尔均回答：“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

子：周尔均人微言轻，这件事他能办下来吗？

父：周尔均是出面的，背后是张震呀。他为我们很用心，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时，胡

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对话》下，页898-899

◎ 九二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回忆录》下，页988

在张震请吃饭这么一件小事上，《对话》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加了许多有水份的“料”。

1、张震请吃饭的起因。据邱会作长子邱路光说：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是原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当时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军籍等。春光（黄永胜长子）告诉我后，我也想打张震的主意。因为张震和我母亲很熟悉。我给张震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母亲的情况，请张伯伯帮忙。我在信中最后说：“一言以蔽之，按项辉芳落实政策的标准给胡敏落实就感激不尽了。”张震伯伯是个好心人，他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因为我母亲不是国防大学的干部。但张震他想对我爸爸这个老战友有个交代，这就是张震请吃饭的起因。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张震请邱会作吃饭实属不易，也反映出张震将军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但张震毕竟是以夫妇二人的个人名义请吃饭，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更不宜张扬，这次便宴不是在通常国防大学领导宴请宾客的地方，而是在校内半山上，给刘帅盖的别墅内。因此，“张震已率几名将军在饭厅前等候，……张指着坐满饭桌的陪客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这样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存在。据参加宴请的胡敏老人和其长子邱路光说：“那天吃饭的只有张震夫妇，邱会作、胡敏、邱路光和周总理的侄子周尔均（周尔均时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而非主任），仅此六人。说‘除了政委李德生没有来，领导都到了’，完全是谎话。”且当时李德生已不在国防大学政委任上（政委已由张

震兼任)。

2、据胡敏老人和邱路光说，张震的开场白只说了“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回忆录与此话相同）。张震没有说：“今天的客人我不说大家都认识，和我有‘五老’之谊，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兄弟。”饭桌上仅六人，哪有“大家”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震以请老同学吃饭为由是很智慧的提法，不会有其他的提法。

3、邱会作并没有求助于张震说“我老伴的事情请你过问一下，帮个忙。”据路光介绍说：我父亲是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根本没有给张震说程光编的那些话，但我父亲知道我给张震写了信，他想既然张震请吃饭，那么估计请他帮助胡敏落实政策的事，他不会推。果然，在吃完饭，临走时张震把我写的信拿出来对我调侃说：“路光呀，你的信我看懂了，那就是‘一言以蔽之’。”我说：“对对对！”张震又接着对我父母说：“胡芝敏（我母亲原名）的事我尽力办，不知人家买不买账。”然后，秘书把我们送回了家。张震根本没有说过“老兄弟，有什么事让我办吗？”的话，张震也没叫周尔均去办此事，张震更没有说“你的老部长和总理的关系你很清楚，你和总后、总政都熟悉，这件事你要具体负责办好”及周尔均回答“为老首长老阿姨办事，论公论私我都义不容辞”类似的话。整个席间周尔均只说了一句话：“两位部长都是我的老首长”。《对话》整个场景都是编的。

4、根本没有张震叫周尔均“特地从军纪委调来案卷研究。”的事，也没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说：‘胡敏认错态度不好，对革命有刻骨阶级仇恨。’我后来听说，张震一听那样的话火气就上来了，说抗日战争时期胡敏是新四军四师师部卫生所负责人，在日寇突然进攻扫荡、我军慌乱后撤退时，胡敏不顾自己寄在老乡那的年幼女儿，照顾重伤员撤退，那个女儿就丢了。她努力工作，获得‘战斗英模’称号，这在非战斗人员中是罕见的。胡敏这样的人对革命刻骨仇恨？你们胡说八道！”

张震当时不是军委副主席，而是国防大学校长，根本没有从军纪委调卷的实权和地位，况且胡敏这一级干部的案卷也不在军纪委，而在总后。既然没有从军纪委调卷，也就不会有“总政去人劝张震别管闲事”，张震根本没有因此事接触

过总政，更没有说过这些话，胡敏毕竟是邱会作的老婆是敏感人物。张震只是通过个人渠道，联系总后领导，希望落实政策，并告诉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已在国防大学落实了政策，给予暗示。

#### 四十五、落实安置和战友探望

◎ 父：我们最先找到军队，被关押的人刑期一到应当和原单位联系。但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对地方的部门，什么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

……

陕西省委和公安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军委总政治部，说中央最早的安置方案就是回到军队养起来，到了总政治部就被挡住了。

……

子：恰好哥哥遇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叶选宁，叶剑英元帅的二子、刚升任的总政联络部部长。叶剑英和余秋里是儿女亲家，叶选宁认为帮个忙不难。他还说，叶帅和你关系密切，他知道。叶选宁向余秋里一说此事，没想到余说，“我不认识邱会作！”

……

子：据说，余秋里沉默了许久，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事后，叶选宁向我们表示歉意，他为了帮助我们，还找了杨尚昆。

……

父：最先来看我的是过去的秘书、警卫员、服务人员。你们的那位刘叔，为我做了几十年饭的炊事员，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

南军区的干部，有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对话》下，页892-895

◎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谓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动我，找找当时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没有答应。经孩子再三动员，我说：“我谁也不找，如果要找我只找余秋里。”我写了一个简信：“余主任：你好！我在电视里看见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况，不要把你吓死。我心中的苦比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苦还要多二万五千倍。致礼！邱会作。”我的大儿子路光找到叶帅的儿子选宁，选宁非常尽心，他先给杨尚昆（军委秘书长）打了电话，杨的态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反映一下情况，毕竟是到期了，应该由军队养起来。为了摸清情况，选宁又把路光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顾林舫正好是管这件事的，顾对路光说：“你爸爸到期了，理应安排，他们吃了苦头，唉，正确对待吧。安排的原则就是原单位管，你爸爸的原单位就是军队。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总政就是不同意，给安置工作造成困难……”选宁又给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打电话，余却把选宁批评了一顿。对党内斗争，我有思想准备，但对战友之情的变幻，我没有思想准备，此事我心里着实难过了一阵子。——《回忆录》上，页98

反映情况的过程，《回忆录》讲的很清楚，可是《对话》又做了很多不实事求是的延伸。

1、据切实了解，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总政，因此不存在“总政治部接待的人说，凡涉及‘林彪案’的人，无论职务高低、牵连深浅，都要交地方公安部门。”

2、邱会作家人根本没有找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因此根本不存在“公安部、司法部、中纪委找来找去，找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他们答复说，军人的法律处置及善后安置在军队，应当去找他们。”正如《回忆录》所说，邱路光只是通过同学叶选宁，把他介绍给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顾林舫。邱路光是通过个人渠道找顾林舫，顾林舫也是以个人身份回答邱路光的提问。

3、邱路光去拜访叶选宁时，是与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一同去的。据他们

回忆，叶选宁当即给余秋里打了电话，余根本没有说：“我不认识邱会作！”余秋里回绝的话是“这样的事也能管得了？”也不存在余秋里“严肃地对叶选宁说：‘你已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了，要有应有的政治觉悟。’”

另外，邱会作来北京是不想见人的，除少数挚友外，根本没有见人，根本不存在“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看我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2000年那次来北京，邱确实是见了原来的炊事员刘玉胜，是邱会作亲自到刘家里看望的，也没有“一见面就激动得抱着我泣不成声了”。也根本不存在来看邱会作的“有总后机关和国防工办的干部，有新四军四师、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的老同志，有原四十五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这个牛吹大了，来看邱会作的没有一个原国防工办、延安中央军委供给部、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干部。

【访谈】

邱会作访谈录

(根据录音记录，未经谈话者本人审阅)

时间：2000年6月25日15:00至17:30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总后干休所9号楼5号

访问人：刘先生

邱会作（以下简称“邱”）：研究文化大革命，企图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开，是错误的。周恩来是正确的，毛泽东是错误的，不可能！这些我们以后再说吧！

上一次我说漏了一点。谈罗瑞卿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上海会议时，林彪把人事问题定下来了，萧华是秘书长，杨成武是代总长。定下来后，杨成武大为不满。我们知道的情况，他当时不说话、不开口、不问事，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呢，他就通过叶帅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萧华当秘书长，在军队能够肃清罗瑞卿的影响吗？

因为萧华是被罗瑞卿拉过去的人。叶帅就反映了杨成武的意见，他立即就向林彪报告了。林彪定下来了：叶帅，副主席兼秘书长，杨成武还是代总长。

杨对这个代总长极为不满，可能这对他以后不听林彪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一小段忘记同你说了。

刘：您刚才说萧华被罗瑞卿拉过去了？

邱：拉过去了。

刘：他们两个人原来的关系就非常好吗？

邱：不是原来就好，就是拉过去啦。是林彪硬把他拽回来的，这是费了很大的事的。因为当时不把萧华拉回来，对同罗瑞卿的斗争有一定的妨碍。

刘：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

邱：当时，林彪要不把萧华拉回来，对林彪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不利的。这个

意思你懂吗？

刘：是不是就是说林彪斗争不过罗瑞卿？

邱：不是斗争不过罗瑞卿，是不利于这场斗争。斗过斗不过，不能这样说。萧华也不是林彪与罗瑞卿斗争的砝码式人物，就是不利。

刘：为什么说不利？

邱：不利，就是因为林彪上台这一段时间里，萧华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人物，在军队里有一定的影响，萧华能够影响一批人。这你听明白了吧？

刘：明白了，他能影响哪些人呢？

邱：这个只能抽象地说，具体说像梁必业、王新亭、萧向荣这些人，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后来在罗瑞卿的问题上，萧华到底有一些……？

邱：罗瑞卿就公开把他拉走了嘛，当时萧华在天津休养，罗瑞卿专门去看了他，和他商量了好多事情，这样讲你理解了吧？这是补充的。

刘：这个补充非常重要。

邱：今天就谈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在军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战争时期有战功，解放以后在国防建设上有比较大的贡献，他是林彪的积极支持者。杨成武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对我个人的关系也挺好的；我对杨成武是很尊敬的，把他当做师兄看待。下面分别几个问题来谈杨成武。

第一个问题，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

1967年9月26日，成立军委办事组，<sup>1</sup>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这个时候，杨成武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他实际上成了军队实权的统帅人物，也可以说是第三号统帅了，毛主席、林总、杨成武。他是有职有权，说话算数，林彪对杨成武是还没有交班的接班人，杨成武对叶群是亲密的关系，林彪的大小事情都是要经过杨成武才能办得通。

杨成武在文化大革命中办了好多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徐向前的全军文革组长倒台，到了8月，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是无政府了，没有人管了。8月，周

<sup>1</sup> 余汝信注：应为9月24日

总理向林彪建议成立一个“四人小组”，成员是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张秀川，名字就叫“四人小组”。“四人小组”就是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立军委办事组，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归杨成武领导了。杨成武领导做了好多事情，比如解决“五一三”的问题，当时杨成武陪着毛主席在武昌，他是专程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当时南京军事学院两派，支持王平的一派，支持张震的一派，大概是1967年12月间，杨成武派我和张秀川到京西宾馆接见南京军事学院的两派，他交待我们对张震要表态，对王平不表态，什么话也不说，说张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张震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两句话是很关键的呀；解决铁道兵的问题。铁道兵也是两派，一派是司令员、政委，李寿轩、崔田民，一派是罗华生，柳庆堤。<sup>2</sup>柳是铁道兵学院的政委，<sup>3</sup>也是杨成武交待我和张秀川去处理的，处理的时间比较长，开了好几次会，最后，还是杨成武决定支持罗华生、柳庆堤，<sup>4</sup>由罗华生主持铁道兵的工作，罗当时是副司令员；测绘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了叶帅的宿舍，杨成武指定我、张秀川、温玉成严厉地批评了测绘学院的造反派，公开批判、指责。还有很多工作，不是一次了，文化大革命很复杂，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日常工作，多数是我和张秀川处理的。

第二件大事，开始组建总政。原来总政的人，一个他也不要。他在军委办事组下，已经建立了3个工作小组，一个是政工组，组长是刘锦平，一个是干部组，组长是北京军区炮兵的政委，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一个是宣传组，组长想不起来了，好像是田维新。杨成武也拟定了李天焕任总政主任。这个杨成武没有同我说过，李天焕也没有同我说过。李天焕，我们很熟悉，李天焕不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sup>5</sup>但杨成武让他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他在军委办事组主要管专案，他也天天到京西宾馆上班。李天焕有一天同我闲谈，我们有一小段对话是开玩笑的，我就知道了。李天焕说：老邱啊！总政的事情难办！他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了，我说：当官就不要怕当大官，官越大越好。李天焕又说：我要是有你那两下子，再大的官我也不怕啊！我又回答他说：你的条件比我好多了，有人支持你当大官。

<sup>2</sup> 余汝信注：应为李庆柳。

<sup>3</sup> 余汝信注：应为李。

<sup>4</sup> 余汝信注：应为李庆柳。

<sup>5</sup> 余汝信注：李天焕1967年11月至1968年3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们就笑笑地算了事了。这就很明显了，他是杨成武内定的了。杨成武没有同我说过，我也没问过。杨成武过去就是这样，你要问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讲，所以我从来不问他。

第三件大事，发表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它是怎么来的、它的过程我不知道。据说是总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稿件，文章经过很复杂的过程，陈伯达还参加了修改。在上海，杨成武也把它放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了，毛主席过目没有，不知道。发表以后，我就知道了。为了发表这篇文章，开天辟地、军队有史以来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当时不叫新闻发布会。会议可能是张秀川主持召开的，就是说什么时间要发表一篇什么文章，各军区、部队要好好组织收听，保证收听的效果。文章发表在1967年11月初，文章发表时，《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解放军报》登在第一版，<sup>6</sup>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的版面非常不满意。发表的第二天，我和张秀川、黄永胜、戚本禹都在杨成武家里，就谈起了《人民日报》的版面问题。当时，戚本禹非常抱歉，说发表在第二版是大大的不应该。戚本禹提出第二、三天重新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发表。我和张秀川提出不宜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怕引起误会。杨成武同意我们的意见，没有重新发表。这篇文章在福州军区有反映，江西省的一个战士，还是炊事班长，他的意见很简单，威信是树不起来的，“大树特树”是错误的。战士的意见是对的，福州军区，也可能是杨成武的旨意了，就把这个战士严肃处理了，复员还是开除回家了。杨成武下台以后，黄永胜又重新把这个战士叫回来了。杨成武下台后，不知哪里传出来的，毛主席也说：大树特树，名曰树我，谁知道树谁啊，也许就是树写文章的人。

**刘：**毛主席说这个话，是在杨成武刚下台的时候，还是在以后的什么时候？

**邱：**杨成武下台前后。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这个影响很大呀！第四件大事，组织编写《党史纲要》。这是一个庞大的工作，杨成武调集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陆军、海军、空军的笔杆子，有几十个人呢，组织了一个大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党史纲要》。经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第一稿，到杨成武下台前，已经有了正式稿。《党史纲要》的内

<sup>6</sup> 余汝信注：邱会作的记忆有误，《解放军报》也是登在第二、三版。

容同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一样，从党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口径是毛主席是领袖的地位，林彪是接班人的地位，江青是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地位，肯定了这三个人的历史地位。周总理都没有单独肯定过，只是在写一些事件时出现了名字。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党史纲要》，我无意中问过杨成武一次，我说这个事情不是由军委办事组能够完成的任务，这是中央的一件大事。杨成武说办事组将来要办大事，我们的眼光要大一些。他讲很快就要开九大了，现在需要有一个正本的《党史纲要》。写《党史纲要》的人，还是黄永胜上任后才解散的。稿子我看过，后来被杨成武下令销毁了。以我所知道的，毛主席不知道编《党史纲要》这件事。但是，这个我不敢肯定。林彪、江青肯定知道。

**刘：**后来大批判时，说这个稿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很不满意，说：“烧掉。”

**邱：**这个当时我不知道。第五件大事，组织“红太阳图片展”。地点在军事博物馆，图片有350幅，有一些是大幅的。展览同《党史纲要》的精神是一致的，肯定了毛主席、林彪、江青的历史地位。找不出来江青和毛主席政治性的照片，有的都是生活照片，选了一张李讷在毛主席的肩膀上、江青站在一边的照片，用这张照片代替政治性的照片了。这个展览江青参观过，她很满意。我去看过一次。编写《党史纲要》和组织“红太阳图片展”，是张秀川具体办的，你有机会可以访问张秀川。

第六件大事，是搞垮了总参内部的造反派，杨成武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没有被冲击的人，但总参内部以贺龙办公室为主发动了一个反总参党委的运动。杨成武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击，王尚荣、雷英夫他们是被打击的，我没有参加反击。杨成武还动员了北京的陆、海、空军一起参加。当时，总参的楼上，大字报铺天盖地。这是杨成武领导文化大革命办的大事，他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并不长，从1967年9月开始至1968年3月，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杨成武要更换空军司令员。

问题的起因在1968年3月初。当时，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杨成武突然不来了，过了一、二天，吴法宪也不来了。以前，杨、吴一般都是下午3点至京西宾馆，晚上8点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天天如此。他们不来了，

就剩下我和张秀川，李天焕也不来了。隔了三、四天，吴法宪到军委办事组来了，打了个照面，他说：空军现在有点事，我要处理空军的事情，这几天就不来了，有事你同张秀川处理。我说我们能处理什么事情啊！他说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就留下。

杨成武要更换空军司令员，起因据说是他女儿的婚事。他的女儿在《空军报》，年龄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对象，杨成武的老婆赵志珍就去找余立金请他帮忙，余立金满口答应。事实上，赵志珍去找余立金的时候，她的女儿与余立金的秘书已经勾搭上了。从此，赵志珍去找余立金为了她的女儿的婚事，杨成武找余立金就让他改任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为了女儿的婚事，没有向余立金开口是有可能的。杨成武先同余立金商量好了，然后才同吴法宪说：你的工作超出空军范围了，将来总参工作要以你为主。所以，我考虑你免去空军司令员，由余立金改任空军司令员。

开始，吴法宪还客气一些。他怎么想的也没有说，他说我干什么都在杨代总长的领导下工作。这件事情吴法宪很快就报告林彪了，林彪不知道，林彪是从吴法宪口中知道的。开始几天，林彪以为这是杨成武的一种考虑，他没有重视杨成武的这个做法。又隔了两、三天，杨成武就主动了，他说：我考虑成熟了，余立金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主持总参谋部工作。

这个时候才引起了林彪的注意。经过好几天的工作，林彪坚持说服杨成武放弃他的意见。林彪不同意杨成武的意见，还是照原来的班子工作。

**刘：**林彪提出了一些什么理由呢？

**邱：**林彪没有理由，就是不合适，吴法宪不能离开空军。林彪动员大家去看杨成武，因为杨是带病休养嘛！杨成武自己说他有病嘛！动员我、李作鹏去看杨成武，还让吴法宪每天去。也动员在北京的黄永胜都去看他。经过半个月，3月16日，杨成武态度强硬了，杨成武对吴法宪说：我的意见不能变了，我已经定了，你报告林副主席，我立即下命令。又过了两天，吴法宪又去看他，杨成武问吴他的意见报告林了没有，吴法宪直接说：报告了，林副主席不同意。杨成武说：不同意，那我们就去江青同志那里去说，江青同志赞成我的意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摊牌。他把江青搬出来了，用了“摊牌”这个词。

这个时候，林彪就为难了，林彪为难的是两点：一是杨成武的意见不能同意；二是到毛主席那里报告，又不能涉及江青，不能把江青的问题摆在毛主席面前。3月18日，林彪直接报告毛主席了，就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包括杨的女儿婚事等都报告了。林彪主要讲：杨成武骄傲了，换空军司令员都没有事先同他商量，自作主张。

照一般的工作程序来说，杨成武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不能说不能考虑这个问题，但考虑这个问题的程序，首先就要向林彪报告，然后再同吴法宪商量，杨成武同林彪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林彪说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

林彪还说了另一个问题是很多高级干部杨成武都看不上眼，杨勇、韩先楚等他都要换掉，杨成武是重新配备干部了。林彪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不准确，好多军区、兵种一级的干部，他都要改变。这个意思你听懂了没有？

刘：听懂了！

邱：毛主席也吃一惊啊！毛主席大概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在变化，杨成武也在变化，杨成武变得这样骄傲自满是意料之外的。3月19日，毛主席与林彪定了，杨成武下台。毛主席的原话是：搬掉障碍兵，解放大多数。毛主席让总理经过常委会的形式解决这件事情。周总理比较早就参与这件事了，陈伯达、康生到会了，杨成武下台的事情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后，第一个措施就是更换卫戍司令。3月20日或21日，卫戍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总理宣布的命令，陈伯达也到场了，我同李作鹏也到场了。宣布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免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会议时间很短，总理发表了很短的讲话，总理说的意思大概是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动员大家坚决执行命令，搞好卫戍工作，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这个傅以后再同你说，傅是为了鲁迅稿件的事情，是在杨成武事件之前的事情，江青知道杨成武要下台以后，是江青把他搭上去的，说傅也要下台，是江青临时提议的。余立金是被动的，他主要是皖南事变中自首的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杨成武从家里到人民大会堂。

我和李作鹏参加了中央对杨成武处理的一切事件，我们是宣布傅崇碧免职时就参加了这个事情。3月2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央文革碰头

会的人都在场，总理正在交待王新亭去杨成武家里把他叫到人民大会堂来。王新亭表现得唯唯诺诺，不知如何是好。我同李作鹏站的位置同总理很近，我同李喆咕，我说杨成武家保存有大量的秘密资料，不要让他毁掉了、搞散了。李也同意，他让我向总理提这个问题。我就向总理说了不要把资料毁掉了、搞散了。总理说：是啊！王新亭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么萎靡不振的样子！你同王新亭、李作鹏一起到杨成武家。

周总理就布置任务了，他说：由中央警卫团去一个中队，王新亭跟着去，对杨家的控制、保护资料、安置家属归王新亭负责；你同李作鹏两人主要是把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来。周总理还交待说警卫部队先出发 20 分钟后你们再去。

我本来对杨成武没有恶意，当时也想过自己多事了。

到了杨成武的家，中央警卫团是越墙而入的，把办公室、保密室控制了，王新亭把家属集中到楼下的会客室里，我和李作鹏才去的。我们直接到了杨成武卧室的外间，他住的房子很大，是元帅的房子。我们进到杨成武卧室起码 15 分钟以后，杨才从里间出来。当时，杨成武全变样了，杨成武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头发、胡子都是白的。杨成武是少年白头的，他平时是染发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杨成武坐在最北面，李作鹏坐在西面，我坐在南面，杨与李坐得近一些。杨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你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呀？！”因为李作鹏坐得近，李作鹏就说：总理叫我们来叫你到大会堂开会，总理请你到大会堂去谈问题。杨成武就坐在那里，也不抬头。又隔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他说了第二句：“你邱会作也要有良心呢！”我就没有回答他，这个话对我刺激很大，我心里很难过。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对我的工作支持很大，对我也挺好的。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埋怨自己多事了，不应该向周总理提这个建议。

又过了一段时间，跟我们去的中央警卫团的领导人进来向李作鹏报告，杨的家属都在楼下集中了，家属要求杨走时要见一面。李表示可以同意，我也点头了。然后我们下楼，杨成武就进了会客室。当时很凄惨的了，杨的全家人都在那里了，全家人都哭成一团了。杨成武的大女儿很坚强，<sup>7</sup>说爸爸不要担心家里，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家里的事情我们自己能管。然后，杨成武就同我们到

<sup>7</sup> 余汝信注：应为二女儿。

了大会堂，这就是杨成武从家里到大会堂的全部经过。

到大会堂后，我们把杨交给周总理，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黄永胜是怎么来的，下次我再同你谈。

第四个大问题，“三二四大会”。

“三二四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召开的，毛主席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是周总理或叶群传达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杨成武是华北山头的后起之秀，他在华北是很有势力的，是有声有色上台的，现在不能冷冷清清地下台。要开大会，把华北师、地以上的干部都叫来开大会。林彪同志要去做报告，把事情说清楚。毛主席还让讲一段哲学、讲一段辩证法。

大会参加的人大概有六七千人。林彪讲话讲了杨成武不能容人，林彪还比喻说他看不起他耳朵之上的人，只要他耳朵之下的人。

林彪也讲了辩证法。林彪讲：毛主席是哲学专家，是我们大家学习的老师，毛主席是哲学权威。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记得林彪讲得最精彩的话是：什么叫辩证法，发展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发展法。这句话引起了哲学界的共鸣。好象以后好多报纸都引用了这个话。

他也讲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要我为她说几句话，江青同志政治上很强，又是有文艺专业水平的同志。林彪要紧的话就是这么几句。

吴法宪、姚文元、康生、陈伯达、叶群也讲了话。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北京的人都讲了话。

这个会议第一次开会的铃声响过后，周总理进来了，他一到场就发现没有元帅参加，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首先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分别通知了元帅。我记得叶帅、刘帅、徐帅、陈毅老总到会了，所有的元帅都来了吧。因为通知晚了，主席台上要变换座位，总理最害怕触怒江青。已经打铃了嘛，他就灵机一变，让我和李作鹏陪着元帅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了。

会议不久，我收到一个条子，这个条子没有署名，很简单地写道：“元帅何罪，为什么不能坐在台上！”会议结束后，这个条子我给了周总理，总理很感慨地说：“一切由我负责，现在也无法解释了！”

“三·二四大会”从发通知起都是我一手办的。

刘：当时发通知时，没有想到要通知老师吗？

邱：那是按总理的安排办的，总理怎么安排就怎么办，他也没有说老师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对杨成武的安置。

中央决定杨成武交给河南管理，住在中等城市，河南决定住在洛阳。杨成武可能是隔了一天离开北京的，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晚上，也在福建厅，也可以说给他送行吧！周总理、林总、江青、陈伯达、李作鹏、我、黄永胜几个人。林总拉着杨成武的手，说：你到外面去住一个时候，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你的一切待遇不变，还保留你的副总长职务。杨成武说了什么，我记不住了，他说我犯了错误，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个记得很清楚。杨成武也说了两三句话。

当天就离开北京了，派专机送的，安排住在洛阳龙门的一个高级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我去过，人家说那是蒋介石的行宫。龙门到洛阳只有十二公里。

到了洛阳，军委办事组定下来，杨成武的事情归总参王新亭管，在办事组的范围由我管。我们对河南有具体交待：生活要管理好，要有医生、炊事员、管理人员；生活费用自付，超过部分一切由公家报销；吃粮不受限制。后来他的孩子去了，我们也交待了，家里人口多了，生活困难可以补助。河南管得也很具体，是看管他还是招待他，没有什么差别！对他子女的处理分两步，第一步是所有的子女连他的母亲都送到洛阳，第二步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所有孩子都回原单位，除了他的母亲和最小的上学的孩子留下，其他都送回原单位了，他的生活标准，一切都没有变，该发什么就发什么，还是副总长待遇。

只有一件事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他的母亲死在城里的一家医院里了，他要求去料理后事。这个我们不能决定，办事组正式报告了总理，总理有电话通知告诉黄永胜：不要管，不要解释，不能去。三个意思：军委办事组不要管，不要向杨成武解释，杨成武不能去。我同你谈的，同你知道的，可能就相差很大了！

刘：出入很大。

邱：3月份杨成武在家里不出门，他是准备取消代总长的这个“代”字的，连章都刻好了，就是总参谋长办公室，原来是代总参谋长办公室。他重新刻了一个图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

刘：这是后来把他家里文件收集起来以后发现的吗？

邱：对。

刘：他当时为什么提出要把吴法宪调到总参来负责？

邱：他自己是统帅地位了，是中央军委的主持者了，取代林彪了。

刘：他为什么突然要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呢？

邱：这个没有根据。

刘：他和江青有什么……？

邱：这个我们也想不通，没有任何根据。

刘：叶群经常往钓鱼台跑，像这样大的事情，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邱：她也不知道，林彪一点不知道。这是个谜，杨成武同江青的私人交往还是个谜。江青，她可以胡说八道，但杨成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对胡说八道他是可以识别得清楚的。她给了他什么条件，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

刘：主席到底知道不知道？林总向他汇报了，他有什么想法吗？

邱：19日他就知道了嘛，在此之前，他不知道。

刘：那就是江青与杨的……？

邱：江青一天去看他一次，这个还是个谜。他脚踩两只船，林彪那里他是保险的了，他为什么又要踩到江青这一边，江青的家庭关系，她是一个什么政治地位呀！杨成武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对中央提三个希望：（一）希望江总书记能够派人过问我的事情，请他了解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二）希望不要否定我的革命历史。（三）希望我死后能够给我一个见毛主席、周总理的“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的意思，你也懂得。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欲望，照我的想法，把我们这些人处理好，对党是有最大的利益，别看我们这几个人，我们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影响很大的面啊！这是一个冤案，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央要处理这个问题，对我们当然有利，对我们党没有利？对党有很大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吧！我就这三个希望。

这是一个冤案，是全国、全世界皆知的。我们是什么反革命呀？！什么也找不出来！起诉书列在我名下的，只有不到300个字，除了虚词之外，实词200

多个，一个反革命的字也安不上呀！能有什么呀！

我对共产党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自然的共产党员，虽然我没有党籍了，但我还有党性，共产党成为我自然的东西了，离不开了。我14岁参加革命，我这一辈子就是革命了，革命是我的职业了。我们老同志说，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对了。我说那还要解释解释，要叫做自然共产党员，是自然的，你开除也开除不掉，组织上可以开除，思想上你开除不了，我什么事情都想到共产党！我这个话你听懂了吗？

刘：我听懂了。

## 【往事】

## 我的回忆

## ——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

蒋平安

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不少材料。其中看到杨成武将军向记者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迫害的那一篇文章，这又把我的思绪引到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使我再次想起那天，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1968年3月22日夜里，是我跟随我的首长邱会作将军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将军，把杨成武从他的家里带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交给了周恩来总理。

我说带杨成武，而不是抓杨成武，这是十分准确的语言。因为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是邱会作的上级，俩个人的工作关系和感情一直很融洽，我也认识他，连他老婆赵志珍也认识我。我们对杨成武一点敌意也没有。1967年1月，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差点被造反派打死，在邱会作被林彪派叶群和陈伯达营救出来，送到翠微路总参三所二楼，当时杨成武得知邱会作被救出，立即和夫人赵志珍赶来看望，杨成武抱着躺在床上被打的不能动的邱会作，边哭边问候，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一般。从我跟邱会作当警卫员以来，从在三座门军委开会，到京西宾馆的军委办事组办公，以及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召集的会议及其各种场合见到杨成武的机会不计其数。更有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杨和邱都在毛主席身边。杨的夫人赵志珍有时见到我还有意说上几句闲话。有一次，在京西宾馆，我碰上杨代总长和赵志珍，赵喊住我，我走过去，赵对杨介绍起了我，说这就是邱部长的警卫员小蒋，这孩子可好了！杨说，我知道，认识他。那时，我们对杨成武都是很敬重的！怎么9·13之后，杨成武对记者说，那天晚上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翻墙冲上楼闯进他的卧室去抓他？！这是不真实的。

杨在他的回忆《文革中遭受林彪迫害全过程》中说：“我的家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有两个营，包围起来”；杨成武还对记者这样说：“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杨说他（自己）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的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杨说：“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杨说：“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那伙。”

这些，杨成武完全是向记者瞎说。其他的我先不讲，我要问杨成武，你此时见到黄永胜啦？我可以这样说，黄永胜还在从广州来的飞机上呢，还没落地呢！

事情经过当时是这样的。1968年3月22日，晚上九点左右，我跟随首长从京西宾馆军委办事组会议室到达人民大会堂，总理在福建厅召集会议，进北门。首长进去后，我被拦了下来，我心里明白，这是警卫级别提高了，一定有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在里边。我把首长的文件包交给首长以后，就回到车里等待。车也不能停在上边，而是停在大台阶的下面。回到车上，我观察除了有几辆吉姆和伏尔加外，还有三四辆军用吉普车也停在离我们的车不远的地方。这和平时是不一样的，使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心里想，今天晚上不会是有啥事吧。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最乱的时候，被专案的人多，说打倒谁，谁就倒台了。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在车里，很冷，司机张子贵师傅过一会就发动一下车，眼睛一直注视着大会堂北门，随时准备开上去接首长。大约在23日凌晨一点，我看见几个军人出来了，过了一会副总长王新亭出来了，又过了一会通信兵总部江文主任出来了。我心里想，江文是管电话的，是不是断谁的电话去了。当时我敏感的就是这么想的！

又过了一会，我看见我的首长邱会作和海军李作鹏政委一起出来了。我和周辉（李的警卫员）急步跑上去，把他俩引到车边。到了车边，邱对李说：“坐谁的车？”首长接着对我说：“去杨成武家。我说坐我们的车吧，让张宏在前面（张宏是李的专车司机）。”我知道我们的司机张自贵师傅路不熟，我才这样说的。

车刚起步不久，首长对我说：“小蒋，带枪了吗？”我说：“带了！”我想，首长知道我一直都带着枪，他这是暗示我下来的事情危险，让我警惕！我心里想，是不是什么坏人扣在杨代总长家里，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根本不会想到是杨成武被打倒了！

到了杨成武住地院子外面，我看见警卫刚换过，也就十来个人，并不是像杨成武对记者说的那么邪乎，有两个营包围了他的家。我们进到卫兵室，王新亭正在向两个干部交代任务。王新亭看到邱和李进来了，就把话停了下来，我站在门口，邱就对他们说：“总理指示，带杨纸字不留！”我一听，心里一惊，怎么是带杨呀？！

我们进入杨成武的院子，我走在前面，大铁门中间的小门我用手一推就开了，门没有锁。9·13以后，杨成武对记者说，我们是翻墙进去的！他净瞎说。

我们进到院子，漆黑一片，杨成武住的二层楼里面也没有灯光。我走在前面，后面跟着邱、李，周辉跟在首长后面。一楼的房门也没有锁，我一拧门把手，门也开了。在黑暗中我摸到开关，打开了电灯，杨成武的警卫参谋王大个子站在第二道门那里，他很胖，两眼红红的像是瞌睡熬的。我相信，杨和他的家人听到外面换防的动静，肯定都没睡觉。王大个子看见我们，对首长苦笑着点头说了一句：“邱部长李政委。”我们也没理他。

我打开了其它的灯开关，走在前面，过了大厅，上了二楼。杨的爱人赵志珍就站在二楼楼口。她对邱李也是勉强笑着打招呼说：“邱部长李政委，你们来了！”，接着，突然她就放声哭着说了一句：“邱部长李政委呀，你们两个可是知道我们老杨是什么样的人呀！”虽然他们之间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邱和李又能说什么呢，所以邱和李也没有答腔。

邱和李就走进了杨成武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我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我让周辉下到楼下去。邱和李进到杨的办公室时，过了一会，杨成武穿着睡衣站在他的办公室了。邱对杨成武说：“总理请你去开会。”杨成武不讲话。邱和李也是一句话没讲。我看见杨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林副主席和杨成武的合影大照片。杨的精神不好，他惊恐紧张，但他很沉着，头发长的有些长，黑发下面长出了白发。他们互相之间沉默着。杨成武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突然他有点发火，大声说：

“我要给林副主席打电话！”他抓起了红色电话机，电话没声音，他把电话摔在桌子上说：“你们搞什么名堂？！”邱和李劝杨成武快把衣服穿上。

这时，杨进了他的卧室，我怕杨成武发生意外，就跟了过去。杨和他的儿子东胜在卫生间说话，我想上去干涉，邱会作一把拉住我，按首长的意思，就没有干涉。我想，讲就让他们讲吧，杨也是认识我的，邱和杨的关系一直也是很好的！可是，9·13后，杨成武却对记者说，邱对他说是“林副主席请他去开会”，说是“要给总理打电话！”这无非是他想把和林彪的关系脱的干净些罢了。我想，这是干嘛呢，如果林彪不倒呢，看你又怎么说？！还说“带人闯进他的卧室”，瞎说！

过了一会，杨成武穿好了衣服来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就下楼了。由于杨的身体不好，下楼时我就搀扶着他。因为在这之前，他有一二十天都没去京西宾馆军委办事组开会了，听说他病了。

我们刚下到楼下大厅，杨的孩子们已被中央警卫团的人控制在饭厅，他们看见了他爸，就爸爸……爸爸的一起哭着大声喊了起来！杨看到了他的老母亲，我松开手，我就让杨过去和他的母亲说话。可杨在9·13后对记者说是他“挣开了我们”。当时我没跟过去，没听到杨对他母亲说了些什么。加上他的女儿们喊声太大，杨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小，又有三四步的距离，我们也都听不到。我说杨代总长走吧！我搀扶着杨成武就向外走。他的孩子们这时一起大喊，爸爸……爸爸！再见！再见！保重！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杨的那个女儿杨俊生吧，很烈性，声音最大。这番情景，我当时的心里当然是很难过的。

杨、邱，李坐在我们的吉姆车上。杨坐在邱和李的中间。我坐在司机的旁边。在路过北京卫戍区门口时，杨成武突然哽咽地大声说：“老邱呀，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邱只说了一句：“总理叫你到大会堂开会。”当时邱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可能也不是滋味吧。然后邱和李一路上也没再讲话。

到了人民大会堂，我搀着杨成武上大台阶，进北门，走进了新疆厅。邱，李，杨坐在沙发上，他们之间也没说话，我站在一边。过了一会，我看见总理来了，总理后面跟着警卫，我就退了出来。

23日，天快亮了，我们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总后，首长在他的办公室批

阅文件，没有睡觉。我有些奇怪，就问首长为什么不休息？首长说：“休息个鬼！”一会就到西郊机场接人。一直到早上六七点钟吧，我跟随首长到西郊机场。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司令员下了飞机，我才知道是来接黄司令的。

接到黄司令后，黄坐上了吴法宪的车，黄司令的夫人项辉方上了我们的车，我们的车跟在后面，离开了西郊机场。中途，当他们的车要向人民大会堂方向拐弯时，我问首长我们去哪？首长说回京西宾馆。到了京西宾馆，在车上首长对项辉方叮嘱了一番。我们要离开京西宾馆时，首长有些不放心，让我再去叫住黄司令的爱人项辉方，我赶紧追上了她，首长走过来对项辉方叮嘱说：“黄司令没回来之前你不许给任何人打电话！”项回答说：“是是，遵令！”，项辉方当时也有些紧张，有些摸不着头脑。

24日下午，我和首长就到了大会堂，协助总理准备晚上的大会。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大会，林副主席讲话，讲话后，毛主席接见！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被打倒了。在打倒杨成武时，江青还想把邱会作扯上一起打倒，林彪，总理，主席都不同意，江青才罢手。

2005年，我在郑州遇见了当年在中央警卫局的李建华同志，他已是河南省警卫局的局长了。我俩谈起往事，我问他：“当时在新疆厅我看见总理进来后我就出去了，你跟着总理，你听到总理讲什么了吗？”他说：“我就听到了一句。总理边走边打着手势说，‘杨成武，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杨余傅事件，使杨成武因祸得福，他躲过了9·13事件的打击。谁都知道，他在工作上感情上比谁都超过了和林彪的关系。他在9·13后，对记者讲的所谓他惨遭林彪迫害的事，是说了瞎话的。依我看，他还应该感谢林副主席呢，是林彪保护了他。我认为，杨成武包括黄吴李邱，都是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军政素质很高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打倒的应该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而不是他们。

2008年10月28日，邱会作将军魂归故里，他的家乡兴国人民以“兴国永远是你的家乡”热烈欢迎他的回归。我怀着对首长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了江西兴国人民为他隆重举行的邱会作将军铜像揭幕骨灰安放仪式。我在返回郑州时，首长的儿子老三光光开车送我。在车上，首长邱会作将军的音容相貌，和他在一起

的历历往事，不断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回忆往事，光光对我说：“爸爸说他当年去杨成武家带他是不想去的！”我说：“那怎么行？！是总理让他和李作鹏将军去的！不去，行吗？！”

建议大家看看邱会作回忆录吧，那才是客观真实悲壮的历史！

2012年1月于郑州

## 【争鸣】

## 在学术争论中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更加严谨

## ——与余汝信先生商榷

卜伟华

《记忆》77期同时刊登了余汝信《“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和程光的《共同努力探索历史的真相——回复余汝信》两篇文章，我看是好事。让大家了解双方的观点和论据，有助于对《邱会作回忆录》、《心灵的对话》以及相关资料研究的深入。余汝信《回应程光》一文，基本讲清楚了与邱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关于此事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

余汝信在《谁离真相更近》一文中所列45条，除第9—15, 26—29条外，其余35条，我大致都同意余汝信的分析。我不完全同意余的这11条，情况各不相同，下面一条一条地分析。我所说的并不过多涉及程光行文中的问题，他的问题，余文已经说的比较充分了。我重在讨论研究一下如何在学术争论中使我们的观点更加严谨、合理、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9条（文中说在第447—448页，其实是在477—478页），《回忆录》中所说情况并不能完全否定《对话》中所说情况的存在，余汝信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是他根据现有材料推理判断的结果（这个判断并不具有必然性）。

第10条，余汝信否认林彪说过“陶铸方式”的理由主要是1、《回忆录》中没有；2、毛、周表态后林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第一条理由不成立，显然，《回忆录》不应成为鉴别有无的标准。第2条，还是推理判断的结果，同样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即使“毛、周表态后林不可能有不同意见”这一前提成立，也不能必然得出否定的结论。因为，“林不可能有不同意见”必然要有限制词，如林在“表面上”不可能有不同意见；林“在公开场合”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等。如果认为林可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同意见，那就会否定了这个前提本身！因此，如《对话》所述之情况，林彪在很小的范围内讲了同情陶铸的话，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第11条，关于“求救信”，余汝信所怀疑的两条，一是“用嘴咬着笔如何能写字”？二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搞到纸和笔？其实都不难解决。所谓“用嘴咬着笔”“用手扶住”，其实还是用左手写字（我试了一下，并不太难）。在监视的情况下搞到纸笔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搞到了。

第12条，关于电话求救，余汝信说《对话》中的有关情节“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杜撰的”，结论也有些武断。余的理由是因为程光当时不在现场。其实，不在现场并不一定就必然会杜撰情节。同理，在现场的人也并不一定就实事求是。程光在不在现场其实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于程光是否真实地记录下了邱会作的回忆内容。

第13条，关于谁哭了。《回忆录》说工作人员哭了，《对话》说邱会作、叶剑英、聂荣臻哭了。假定《回忆录》是准确的，也不能据此说《对话》就是错误的。也可能两书说的情况都存在。说《对话》中聂荣臻、刘伯承的话都有臆造之嫌，理由很不充分。说“刘伯承对军外之事所知甚少，对造反派没有感性认识，为人又十分谨慎，毛泽东支持造反，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刘伯承是不会骂造反派的”。这样的推理和结论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第14条，叶群有没有说过“林总提的几条，主要就是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这个话？余汝信否定这个话，理由是“此期间叶群并没有来看过邱会作”。《对话》说“当时”叶群说过这个话，但这个“当时”所说的时间是可以有伸缩性的。比如，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当年”？余汝信否认刘伯承说过“你自己所受的痛苦，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句话，理由是当时在场的邱会作的警卫员蒋平安的回忆中没有此情节。这也是很不可靠的。当年汪东兴组织一帮人批李志绥，很多人都是采用“我们当年都在毛泽东的身边，我们怎么都没听到过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的办法，没有听到过不能证明就没有过，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第15条，邱会作回总后的情节，余汝信认为《对话》中的情节是“不真实地编造、夸大了邱会作等与江青的斗争”，其实也就是两件小事，一是周恩来要邱请中央文革的几个“大人物”时，邱说是他们指使造反派把我差点打死。二是叶群建议邱去请江青时，邱脸色难看。其实这也谈不上什么“与江青的斗争”。

在1967年3月底时，邱会作是否能认清军队造反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也有所怀疑。但怀疑归怀疑，不能因为我怀疑，就可以轻易否定邱会作在当时会说出、做出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话和举动来。

第26条，《对话》中有邱会作九大投票时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余汝信认为这“绝不可信”。我倒认为，邱会作等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对自己较为亲近的人说话时流露出这种情绪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引用当时所说的话未必字字准确。要证明邱会作当时确实有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这件事，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来支持，但要否定邱会作当时有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这件事，同样需要有过得硬的材料支持。

第27条，余汝信说《对话》中邱会作对九大的评价，“决不会是邱会作本人的思想，而是程光本人的思想”。余的具体分析有道理，但显得绝对化了。邱会作去世是在2002年，到那时，他能做出“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样的结论真是完全不可能吗？

第28条，李必达事件，和其它许多条一样，余汝信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这一条对话是否真的存在，说它不存在有哪些理由，二是如果真有这样的对话，这里的说法是否正确及它为什么不正确。这两件事中，第一件事是最重要的，而第二件事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但因为第一件事是很难做到的，而第二件事做好了就可以成为完成第一件事的重要手段，所以余汝信的大部分工作就放到了第二件事上。《对话》中关于李必达事件的叙述不管有多少史实方面的错误，如果余汝信不能证明这一对话内容根本不存在，那他就会离成功很远。因为邱会作本人对李必达事件的了解和认识，肯定会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对话》这本书的地位。余列举了《对话》关于李必达事件的叙述上的8方面的问题后，余只是指出了这些对话中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根本否定这些对话的存在。

第29条，林彪是否说过“就让她当个宋庆龄”？余汝信认为此为杜撰，理由两条，一是林彪深谙中央政治，决不会在部下面前随便对中央主席的夫人说三道四，二是邱会作知道林彪的为人，决不会问林彪这个问题。这样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照此说来，深谙中央政治的林彪，也应该不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随便对

中央主席最欣赏的人物之一张春桥发难了吧？

以上所说，纯为技术层面上的探讨和研究，仅供参考。

**【争鸣】**

此文是余汝信先生对程光先生《共同努力探索历史的真相——回复余汝信》（见《记忆》第77期）一文的回应。作者为了答复程光信中的指责，说明双方的交往原因和过程，在文中引用了程光先生前几年给他写的多封电子邮件。程光先生得知后，请其版权界的朋友多次致电本刊。为顾全大局，编者对这一部分内容做了删节。

**回应程光****余汝信****一、与程光的交往**

程光文中说，“现在我回看他这些年来向我表示‘可以完全信任’和索要珍贵资料的电子邮件（数十封），感到困惑不解。”又说，“余先生2006年与我交往，得知我这儿有父亲回忆稿后想看，我给了他02稿的一些文革前部分，文革后的我没给，因为父亲还没有最后审定，我持慎重态度。”

事实真相是，程光主动与我交往最早还是在2005年。与其确有数十封电子邮件往来，但，一，我没有向他“索要”什么“珍贵资料”；二，回忆稿是他主动提出要给我看而并非是我“想看”的。

幸好，这些往来邮件至今还保存着。

程光的回忆录稿，一看就明白，确实是费了很多心血。惟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修改的痕迹太重，与我后来看到的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相比，他几乎是在重写。他将邱会作的东西基本上都磨平了，令我兴味索然。老实说，他给我看建国后部分也好，不给我也好，我不至于主动去追他。

待到他给我看建国后部分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而且，也还是他主动先联系的。

程光发来的回忆稿，是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部分。这一部分，我的感觉，还是程光修改的痕迹太重，故而，我在电话中有些不客气地直接对他说，

“书稿到底是你的，还是你父亲的？”因为当时没有看到邱会作的亲笔原稿，没有一个参照物，我心中的确没有底，只是一种深度的怀疑。但是，我还是用心对书稿的每一段都提了修改意见。

对我所提的意见，程光没有说对，还是不对；没有说接受，还是不接受。

时间很快，又过去了两年。2011年1月30日，程光主动来信称，有事要给我说。接着，他把《心灵的对话》全书电子版发了给我，要我提提意见。2月11日，我看了一部分后，将我的看法告诉了他：

前天回来，马上阅读了你给我的《对话》。同时，再次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总的感觉，你是下了大功夫的（修改了十七次），也很不容易。因为看得比较匆忙（毕竟有七十万字），其中有些史实上的问题，待在今后几天与你商讨。只是总体上的一些感觉，想先与你交换一下本人的不成熟意见，供你修改时参考。

一、根据你的介绍，《对话》应脱胎于你父亲的书面的回忆录稿。据我所知，《邱会作回忆录》已于近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我前两天在港时亦已购得一套）。该书没有列整理人，只注明是邱会作著，外人会认为，它是你们全家人的精力结晶，似乎不会看作是你哥哥一个人整理的产物。在此前提下，《对话》所体现的邱会作的思想与行为的细节，似应与《回忆录》相一致，使人感觉到《对话》是《回忆录》思想上的延伸，或者说是它的补充和解读，这是最为理想的。

二、《对话》应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背景，如定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直至邱老去世前（2002年）。这样，对话就必须注意这一时间背景，如不能出现2002年后以后才面世的材料（如多次提及的陈伯达回忆，成书是在2005年），另如说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了”是可以的，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就成疑了（1978年至2002年，只有二十四年）。

三、《对话》应有对话形式的口语特点，有些只能或通常仅诉诸于文字表达的字眼、字句，不要放在对话中，即要特别注意口语化，注意用口头语言去表达。

四、《对话》中一些邱老的话，并不象一位少年时代即参加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的老一辈革命者的用语，这一点，希望能引起特别注意！因为有些政治术语等，老一辈的人别说口头上不会讲，写文章也不会用。这些话，读者可能会

感觉到是“子”加诸于“父”的，而不是本来就是“父”的。有一些思想如果你觉得非要表达出来，不如干脆就作为是你本人说的，不必强求非得是邱老本人说的，这样，可能更自然一些。这样对邱老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对话》中，以“父”表达出来的思想，有些还要推敲。

《邱会作回忆录》的语言，我个人认为还是基本上保留了邱老的语言特点的。如果人们以后拿这两本书相比较，可能会有判断，那一本的语言，思想更真实一些？

直白地说，就是不要过于有意识地去拔高邱老的思想，而使读者感觉到这并不像邱老本人所思所言，这样做，会适得其反。69年“九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触到很多的党内大事，但他是在“办公”而非“决策”的位子上，71年就倒台了，在高端也就两年半的时间，因此，这样厚重的总结和反思，我认为不可出自邱老之口，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五、上述的四点，修改起来并不难，将邱老的一些话还原成你自己的话，作为是你讲的就行了。你怎么想，怎么讲，我倒认为是可以较自由发挥的，没有局限性的，而老一代人，则有很大不同。

为此，我想倒过来，先将思想性较强而不需要核对多少史实的最后一部分“反思和总结”看了，并在文中以加注形式提了些个人见解，还是那句话，仅供参考而已。

其他部分，将陆续发去给你。

同一天，程光复信，主要是辩解（原信略——本刊注）……同一天，程光共给我发了四封信（原信略——本刊注）……

既然程光说已经上机，再动员他去改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给他看了两章，同样提出了修改意见。

2月18日，我将附了修改意见的“七二〇”事件一段发给他，以示对他负责的态度，并写了一短函：

因近日时间较紧，我只改了“七二〇事件”一小段，供你参考，其他的还在看。

全书稿类似问题所在多有，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

1、问题说得太细。太多的细节容易出错，很多事情细节不必交代，不如大而化之。

2、由于过程了解不大准确，结论就会跟着不准确，不要轻易下断语、结论。

3、尤其是作为你父亲的话语，必须慎重处理。总的感觉是父亲的话太多，多就易错，且不应该什么都涉及，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实际是不可能的)，像是一位文革的百科专家，这样的权威性反而下降了，如林彪平时的话就不多，但应句句是精炼、简洁、有力的，你父亲应该是那样的人。

## 二、与路光的交往

认识路光，比认识程光迟了大概两年。

路光年长于我且乐于助人。为此，他力所能及地提供过不少重要材料、重要线索给我。程光文中指责“编辑者（余注：似乎是指我）为《邱回忆》加上了别人已发表的东西，当成了邱会作本人的回忆”，提及我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的叶剑英批罗讲话，认为是我给《邱会作回忆录》整理人提供的。这里他恰恰搞反了，叶剑英的讲话，正是路光在我到京时送给我的“见面礼”，条件是想要我写一篇文章。路光说：“看过你写的多篇文章，比较实事求是。现在关于罗瑞卿的问题，谎言很多，包括杨成武这样的批罗积极分子，也在说谎。我父亲生前说，只要找到叶帅讲话的全文，一切都说明白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也充实到父亲的回忆录中去了。父亲回忆录中原来就引用了叶帅的讲话，只是没有这么全面，这么有条理性，现在好了，可以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但父亲的回忆录还在整理中，到正式出版至少要两三年。我们应该让世人尽快了解事实真相。我把叶帅的讲话复印一份给你，如果你认为它对讲清罗瑞卿问题有用，请你写一篇文章为好。”

这就是我写《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的背景。简单地说，叶剑英讲话，是路光给我的，而非《邱会作回忆录》的整理人之一路光“抄”我的。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谁“抄”谁的，而在于：一、1966年4月，叶剑英有没有这个讲话？答案是：叶剑英这个讲话，是上了正式文件的；二、既然叶帅

讲了话，参加会议的邱会作又在场，邱会作的回忆录原稿上也有这一内容，只是记得不全不完整，那么，邱会作的未亡人、《邱会作回忆录》的整理人将其整理充实到书稿中，这又有什么错？在不违背回忆录作者的原意及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任何回忆录的整理者都有权进行类似的整理工作，更不用说这样做的是作者的亲人了。

### 三、关于《心灵的对话》与《历史的回顾》

程光说，“余先生《真相》一文开始就武断地宣称，我父亲和我没有进行对话”，程光在这里是偷换了概念。我不是说程光与其父没有进行过一般性的对话，而是“邱会作生前其实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程光在《回复余汝信》中也说：“有他坐下来长谈，父子问答的内容，有他茶余饭后的三言两语，有陪他散步闲聊时的即兴议论，有他和别人聊天中的内容，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这样零敲碎打的谈话，可以形成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吗？“他和别人聊天中的内容”，也可以化为“父子对话”的内容吗？

程光的所谓“对话”，其实就是口述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运用音传（录音）、进而运用像传（录像）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几十万字的内容，以陈旧的文传（以文字记录）方法能记载下来，记录者又没有经过速记训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程光又说，“也许有人认为，让父亲坐在那里作个一问一答的完整录音录像，才算是真正的‘对话’”，是的，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现代口述历史的起码的技术要求，符合口述历史的一般规范。程光自己提及的“社科院来录的”，就是这样操作的。但程光自己却根本拿不出这几十万字《对话》的父子交谈的录音！

程光的《对话》，其实是将邱会作的回忆录文稿深加工转换而成。程光在《回复余汝信》中也说了，“父亲还委托我把他回忆录后半部分整理好，由他最后定稿”，“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反复研读了四个稿子”，这也说明，退一万步说，即便其父有委托，也是委托他整理回忆录，而不是另起炉灶搞什么《对话》。

试想邱会作生前已经写有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文稿，有待进行的只是文稿

的整理工作，邱会作有什么必要把文稿的内容从头至尾重新“对话”一遍？

将回忆录文本转换成口述（对话）文本，这种转换存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以前对此是认识不清的，因而，才会在今年初还替程光修改《对话》。而后，我请教了口述历史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这样的转换，从程序上说就是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因为这样的“对话”场景是编造的，本身没有进行过真实意义上对话，那么，完全可以不看内容，“一票否决”！

《对话》是以回忆录文本转换而成的一个佐证，是与《对话》同时间出版的程光的另一本书——《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

程光说，“《历史的回顾》从父亲参加革命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按他个人经历的时间顺序，若干‘历史问题’随文于其中，有的抽出来单独说。这次突出了父亲谈的，我更加是一个倾听和记录者，有一些段落很长，都是记录着他的忆述和议论，一口气说完，这样读起来流畅、连贯、紧凑，更容易理解他要讲的内容。”（《历史的回顾》，页2）

程光说的不是事实。对话体的《历史的回顾》，是用邱会作回忆录文稿整体改写的。程光整理的邱会作回忆录文稿，几年前他是发过给我，要我提出修改意见的。在这本《历史的回顾》中，我提出的修改意见痕迹还在（只是程光看了我的意见之后，偷偷改了，而从不反馈给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如“第十五章 工作中南军区”一章：

1、原文稿“1951年春”，余改“据组织史资料为1950年12月”，《回顾》已改为“1951年冬”（页263）；

2、原文稿“兵团又兼广东省军区”，余改“广东省军区应为广东军区”，《回顾》已改为“兼广东军区领导机关”（页264）；

3、原文稿“兵团领导和广东省军区的领导是互相兼任的”，余改“兵团领导兼广东军区职，但广东军区领导并不兼兵团职，不好说‘互相兼任’”，《回顾》已改为“兵团主要领导兼任广东军区的职务”（页264）；

4、原文稿“他（余注：指叶剑英）是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余改“叶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时广东工作由分局直接领导，未另设省

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回顾》已改为“他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由分局直接领导，未另设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页264）；

5、原文稿“1951年秋”，余改“应为1951年5月”，《回顾》已改为“1951年春”（其实5月也不是春天）（页264）；

6、原文稿“受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领导”，余改“时无中央军委，只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回顾》已改为“受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南军区（驻武汉）双重的领导”（页264）；

7、原文稿“华南军区管辖广东、广西、海南岛行政区三个省军区……”，余改“华南军区仅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第41军兼）、粤西军区（43军兼）”，《回顾》已改为“管辖广西军区、海南军区、粤东军区、粤西军区四处省级军区”（省级军区为程光误加，当时只有一、二、三级军区之分而无省级军区一说）（页264）；

8、原文稿“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余改“华南军区叶不兼政委，政委由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在1951年12月兼第二政委”，《回顾》已改为“华南军区司令员为叶剑英，政委由中南军区政委谭政兼，陶铸兼第二政委”（页264）；

9、原文稿“解放初期，军队在一个地区起的作用很大，以上这些人就是华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物”，余改“似不好这么说，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第三书记方方（陶为第四书记）均未在军区任职，还有古大存、易秀湘、何伟、赵紫阳等主要常委也不是军队的”，《回顾》删去了原文稿的这段话。

举以上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一、《历史的回顾》就是以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程光整理版）改写的；二、程光说他父亲的东西是不能改的，是假话，是只针对别人而言的，他自己则大改特改，甚至连整个体例，都要从回忆录文体改为口述对话文体！

邱会作真正的“对话”，应该是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在2000年6月10日至9月14日十六次的“对话”，历时三个多月，也只有十几万字。这些“对话”，有录音记录保存。

#### 四、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

关于中央政治局开会宣布林彪死亡的时间，目前公开资料最权威的是《周恩来年谱》所述的1971年9月14日晚。

《回复余汝信》以“查阅了父亲的回忆录”（不是“对话”了）、“又找出了父亲2000年9月一次录音”（有录音的话，也是研究人员访谈的录音）、“还查看了父亲在1990年《回忆周恩来》手稿”等及吴法宪回忆为理由，坚称为9月15日晚。

《周恩来年谱》所认定的时间，是依据文献档案、周的工作日志，这些当时已经形成的材料，应比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个人回忆准确得多。程光坚持己见，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记忆是否就是客观标准？二、是应该以《周恩来年谱》等准确的材料，去修正邱会作不准确的记忆，还是反过来以邱会作错误的记忆为标准，从而去指责《周恩来年谱》是“伪档案”，是“造假”？

程光的书稿公开出版后，我本不准备再说些什么。但是，可能是有点儿“名人之后”的效应吧，《心灵的对话》出版后，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故而，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对程光的私下批评有所公开。有人说，这不过是私人恩怨，不宜公开。惟正如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所言：书一出来，就是社会产品，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这是大局，也是客观事实，其他事情（不管什么事情），都没法和它相比，都不起什么作用。这，也就是我写《谁离真相更近？》的初衷。这样做，势必要“得罪”程光，朋友做不成了。然而，想深一层，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对得住历史。在历史真相面前，“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朋友之间，容不下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朋友不朋友，也就无所谓了。

2011年11月

## 【争鸣】

## 应该看到两本书大体上的一致

肖百友

我是济南一位读者，这次读了77期上余汝信的《“魔鬼在细节中”》一文，感觉他就程光的《心灵的对话》一书作的一些结论似过于主观武断，下面举出几例求教于各位专家。

例一、余文谈及首都工作组和当时部队编制、调换等，余认为邱会作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对于部队的编制和调动是清楚的，程光《心灵的对话》里出现错误，“显然不会是邱会作本人所述。”然而，笔者却认为，时隔多年后，邱会作在没有其他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对程光的叙述，很难在如此细节的地方丝毫不差，那样只有抄录军队建制才能作得到，而日常谈话不可能那样。所以，不宜以史学研究者考证出来的历史强求回忆者本人。毕竟，回忆录不是严谨的正史，它不考证军队的建制，而只是历史的走向和背景。

例二，余文认为，林彪不可能对邱会作说“陶铸方式”问题并向周恩来通气。然而，林彪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1968年，是针对许世友将所谓的伍豪材料送中央一事，那时陶铸早已经倒台，因此并不存在余文所言“这无异于林彪告诉周恩来要对抗毛泽东对陶铸问题的解决。”《对话》中的意思应该是伍豪事件材料出来之后，要避免周恩来的历史材料重蹈覆辙——如陶铸历史“变节”材料那般突然向社会公布。这一段余汝信搞混了时间，因而也就错会了程光的《心灵的对话》的意思。另外根据林彪私下讲话的特点，林彪这样与邱会作谈及“陶铸方式”是极有可能的，比如林彪在私下与王秉璋谈话时就说过戚本禹是害死张霖之的刽子手，林彪对林办秘书张云生随口而说的蒯大富反对刘少奇实际是反党等，林彪完全可能对邱说及毛死后让江青当宋庆龄，一如林说戚本禹是刽子手、蒯大富反刘少奇就是反党那样。

例三，余文说《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在“九大”期间，没有这个迹象，邱会作也不可能看到这个迹象。但是江青在“九大”

前对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极为不满，曾要影射、批判林彪的讲话。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江青是反对林彪的。《邱会作回忆录》说：“林彪同江青矛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知道的人的圈子很小，严格局限在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几个人之内，……以后，除了上述人之外，陈伯达、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也参加进去了。我还担任了向周总理汇报的‘联络员’。”请看，邱会作自己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他确属了解林彪和江青矛盾的小圈子内人物之一，怎么能说“邱会作也不可能看到这个迹象”呢？余汝信对《邱会作回忆录》那么了如指掌，为什么这里就忘掉了它里面这些重要内容了呢？

例四，余文认为陈伯达与林彪来往极少，陈伯达的闽南话，林彪听不懂。余文由此指责《对话》说：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应无可能，“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更不可能。但是《邱会作回忆录》却如是说：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邱会作回忆录》里的这些表述，说明林彪是可以听得懂陈伯达讲话的，而且还证明，《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在陈伯达找林彪商量批评张春桥一事上是一致的，确有其事，只不过《对话》讲得更加具体一点而已。余文说陈伯达的闽南话林彪听不懂，不知根据何在？如果如余汝信那样说，又如何解释《邱会作回忆录》里的这段当事人的回忆呢？余汝信那样，不仅否定了程光记写的《对话》，也否定了邱会作本人写的《回忆录》，更是否定了余汝信自己从《邱会作回忆录中》所引证和依据那么多的“魔鬼细节”的来源和根本。

2011年12月6日

【文摘】

## 迟泽厚访谈录

### ——学习当代史的若干感受

时间：2011年6月8日

主访：《当代广东》编辑部幸英鸾、王涛、侯月祥

地点：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

**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迟老，研究当代史看似容易，实则难点很多，难度很大。请问能给年轻人指点指点吗？

**迟泽厚**（以下简称“迟”）：指点谈不上，有些个人感受，倒可以共同讨论。我认为，既然是研究历史，首先要正本清源，辨明真伪，避免误入歧途。

**编**：能具体谈谈吗？

**迟**：现在史学界问题很多，有些所谓史作，记事胡编乱造，似是而非；对人则溢美溢恶，为尊者讳；至于哗众取宠的“野史”、“戏说”、“大揭密”之类的东西充斥市场，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造成这种局面，不少作者是因为手中史料不足，功力不够，勉为其难，于是不得不东拼西凑，道听途说；但是也有一些人是缺乏史德，他们心知肚明，却屈从于某种压力，或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蓄意造假。因而，读史首先要能读到“真经”，防止被人误导。

**编**：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迟**：“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时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但它确实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既然是绕不过去，我们就要实事求是，要蹬过去，要认真加以研究。要不百年之后，就会像对《红楼梦》的研究一样，出现很多学派，很多版本，很多猜想，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却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学习和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古鉴今；研究“文化大革命”不是翻旧账，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警示后人，防止重蹈覆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后人有个交代，总不能白交“学费”，否则就是双倍损失。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讳莫如深，视同禁区，

我很难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如果光凭现成材料，对许多过去的荒唐事是没法理解的。研究“文化大革命”，除要翻档案、老报刊和一些领导讲话等外，还是要找亲历其事者，多听听他们的陈述、感受。并且要抓紧时间，当事者越来越少了，要“抢救”活材料。比如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兴起的？两派是如何形成的？广州军区领导介入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是什么？周恩来对广州以至全广东的运动有什么影响？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有何特点，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如何评价广州“文化大革命”的结局？等等，都很值得弄清真相，加以研究，大而化之地套用评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官话，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足以服人。前几年有位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讲周总理1972年明确指示赵紫阳从内蒙回广东管党的全面工作，丁盛却假传“圣旨”，让赵“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但据我所知，当时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广东、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和干部配备问题，赵紫阳开始并没有参加会议。后来还是丁盛向总理建议是不是请紫阳同志也来一下？总理同意后，丁盛派他的秘书把赵紫阳从前门饭店接到京西宾馆临时参加会议。周总理当众指示赵紫阳回广东后分管省革委会的工作。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丁盛怎敢假传“圣旨”？而且回广东之后，赵紫阳在省革委会的小会上讲，他是欠了账的，回来要还账的。那时的广东省委，丁盛是第一书记，孔石泉、陈郁、王首道是书记，赵紫阳不是书记，排名在王首道之后，怎么能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呢？

**编：**当代史的研究是一个严谨的课题，容不得半点虚假，但是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当代史，面对这些绕不过的问题，在当下怎样研究呢？

**迟：**我的看法和做法是：

第一，慎用史料。当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但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我写东西，首先是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加以比较筛选。我用史料不迷信，不看“来头”，包括对官方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很多中共中央文件都有假，经常有后来的中央文件宣布“前文作废”的情况，至于中央报刊就更不必说了。如果你认为出自官方的东西就都可信，那就盲从了。甚至有些形成舆论的东西，也不能轻信。1969年10月，北京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很多人、很多材料都说是林彪为了扫除夺权障碍，发布“一号号令”将他们赶出北京的。其实这事

是毛泽东拍板、经周恩来布置的。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已多次澄清，但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当年的被疏散者和他们的后人，还是要这样说，可能是认为受林彪“迫害”光荣。又如，很多材料说许世友与“四人帮”势不两立，从不交往。这与我所见到和听到的情况大相径庭。例如：许世友听说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正在找对象，便派他妻子田普到上海，说他有二个女儿，请王洪文的这位小兄弟挑一个。不久前广州一个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说许世友在1974年1月收到江青拉拢他的亲笔信，根本不为所动。当时我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许世友拉着赵紫阳一起在宾馆迎候三位送信的使，然后是两次宴请并合影留念；又交代我连夜将信铅印数千份下发全省党政军机关；继而许世友又召集军区党委常委连夜开会学习江青来信，并发电报感谢江青对军区的关怀；第二天开大会向驻广州陆海空军全体干部传达江青来信。这能说是“不为所动”吗？写这篇文章的是许世友的一个秘书，刊登此文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公办杂志。这样“来头”的史料，没人上当才怪！

第二，坚持学习，跟上形势。有些人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稍有满足、稍一停步就会落伍，而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钻故纸堆就可以了。其实，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也在不断发展、前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孙臆兵法？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1972年山东临沂古墓出土了孙臆论兵竹简，争论的问题便解决了。前几年国家花很大气力研究“三代工程”，夏代都城在哪里？武王伐纣究竟是哪一年？甚至连天文科学都用上了。我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满足于当书蠹，抱残守缺，非闹笑话不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更要注意会不断有新材料（包括新解密材料）、新观点出现。故纸堆不可不钻，但不能尽信，前面讲了，其中假货很多。被称为林彪“四员大将”的黄、吴、李、邱，黄永胜死得早，没留下多少亲笔写的东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写有回忆录。他们都是对“文化大革命”有发言权的重要人物。他们书中记述的许多重大的事件，就与以前流行的说法不同。而据我所知，他们几人各处一地，各自独立写作，并无交流，对有些事情的说法却是“异口同声”。你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对这种情况不能不予重视。

第三，用事实说话。“文化大革命”中稀奇古怪事太多。“四人帮”之流善于去真存伪，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许多人和事都是先加罪名，先定性，然后再凑材料，即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人成虎，久而久之，一些人便信以为真。这种恶劣作风并未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消失，一些人仍把它奉为圭臬，流毒甚广。一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在“两案”审判时，却不得不宣布黄、吴、李、邱等人根本不知此事。倘若林彪真在广州成立伪中央，黄、吴、李、邱自然都是主要成员。连他们都不知道的事，与广州军区何干？然而，有人却把这当成杀手锏、紧箍咒，在广州军区机关翻箱倒柜地查了十几年。最后虽然不得不尴尬收场，却也达到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广州军区则从此元气大伤。真是亲痛仇快！所以，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最重要的是先弄清事实，重证据，不要急于下结论。有时，对一些人和事，“盖棺”也不能“论定”。

在这方面，还可以讲个几百年前的例子。明朝末年的袁崇焕，是咱们广东东莞人。孤军守辽，屡败剽悍的后金（清）军，很了不起。而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满洲人的反间计，把他作为汉奸凌迟处死。最可悲的是，有些受蒙蔽的北京百姓，竟在刑场买袁崇焕的肉吃！几十年后，还是清朝皇帝公布了事实真相，这一千古奇冤才大白于天下。要不然，袁崇焕的“黑锅”还不知要背到哪年！但是也有人一直对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定罪不信不服，认定袁崇焕是忠臣、英雄，有一家人还世代为他守墓！这种不唯上、不盲从、不跟风的精神实在可贵。学习和研究历史最需要这种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实在太多了，有些已经平反，有的尚待平反；有的允许平反，有的却不能平反。先入为主、印象第一、主观专断、以权压人，都是要不得的恶劣学风，是研究历史的大敌。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倾向性。但是，即使你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也尽可能采取寓观点于客观叙述之中的办法，少来些贴标签式的议论，把话讲绝。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并没有直接对项羽、刘邦进行评论褒贬，但是他写了二人初次见到秦始皇后脱口而出的话，这两人的性格特征和抱负便跃然纸上了。

**编：**比较研究的方法确实很重要，现在的确有不少是假材料、假史实。有些

谈假甚至带有某种功利目的。

**迟：**蓄意造假，那就是品德问题了。有人打着安定团结的旗号，隐瞒事实真相。我们也主张安定，但是要看是什么基础上的安定，不能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委曲求全。要知道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撒谎后患无穷。当然，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也不能有闻必录，记述总是有所侧重。比如写蔡锷，这当然是个正面人物，但是他的闪光点是反对袁世凯称帝，至于他和小凤仙有什么私情，那就没有必要去写它了，读者也都理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名人的私生活糟糕透顶，有些材料却把他们写成完人，描绘成头戴光环的正人君子，这就是不讲原则，欺骗、甚至是耍弄群众了。

**编：**您现在主要是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

**迟：**我有时对熟人戏称我是个“杂家”，从文史方面的专著到各种报刊，古今中外，什么都看，涉猎颇广，但不专不精。就党史和军史而言，过去在工作岗位上，看书的时间不多，感性的东西多些，现在回过头来看，多一些思考，认识有所提高。

**编：**您现在主要看什么书？

**迟：**我现在大量时间花在阅读报刊上。我订了八份报刊，还常有赠送的报刊，如果都看，二十四小时也看不完。除每天必看的日报和《参考消息》外，看得最多的主要是《炎黄春秋》和《文史参考》，这都是比较严肃的刊物。我本来是不写东西的，但有时看到报刊上登了严重失实的文章，忍不住写点东西说明事实真相，或与之商榷。我写的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或根据手中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我自知文笔不行，但讲的都是真话。

**编：**广州应该是当代史研究的“热点”，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广州，包括解放后的几十年。但研究中也有关点，其中有些就是来自史料的收集、运用和参考。

**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很长时间广东都是风暴的中心，这是广东的特色，也是广东的光荣。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确有难度，但是资料也最丰富。在研究过程中，当然要善于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但更要排除私心杂念，排除偏见，排除外界干扰。这对于你们在职的同志尤为重要，难度也更大。我希望

你们做文史工作的同志，都成为“良史”。

**编：**谢谢迟老的指教。也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广东省当代广东研究会、《当代广东》杂志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关心！

原载《当代广东》2011年第3、4合期

**【编读往来】****1、童话回复鲍国芳**

80期鲍国芳女士回复我的文章已经看到，谢谢！《回复》要说明：1、迫害闻佳的不是她们那一班的人。2、金元老师没有隐恶（其实我说的“慌张”是指受访者在接受文革旧案访问时广义的心理恐惧），而是不知情。《记忆》提供平台供言说很好，我重复这两点作为对《回复》的尊重。

希望读者重视闻佳冤案的史料，注意案情表述的进展。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将有关该案资料的收藏，使人欣慰。

**2、魏明珍介绍王友琴谈宋彬彬的文章**

贵刊80期发表了宋彬彬的长文，这只是一面之词。最近王友琴在《开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李讷、林豆豆、宋彬彬》，关于宋彬彬，王友琴认为：

**宋彬彬至今不为文革暴行道歉**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此案已为中外很多研究、关注文革的人所知。当时担任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和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也是“红色公主”级的人物。她因文革中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出名，在学校九十年校庆时，竟成为九十名光荣的「知名校友」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卞仲耘丈夫王晶尧不得不以公开信方式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公开信没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没有得到宋彬彬和其它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答复。这封信也没有能在国内纸质媒体上发表，只是由王晶尧的年青朋友帮助送上了计算机网络而得到了“公开”。

二〇一〇年，北京一家名为《记忆》的网刊发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个座谈纪要和一些其它相关文章，共五万多字。这些文章的主题之一是为宋彬彬辩护。后来，她们还要求纸质刊物发表她们的文章，未发，因为宋的丈夫不愿意她抛头露面。她的丈夫发现癌症，要等他去世后再发。最近

网上报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剑生因肺癌在去年十一月去世了。同时有消息说，宋彬彬等人将再次发动。

附带指出，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青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剑生的姨妈多次到他插队的内蒙古，说服军代表。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他应该明白用家庭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维特兰娜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她在书中对苏联将领导人家的保姆厨子都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浪费和没有人情味作了深入的批评。这些显然不能影响到宋彬彬。

二〇〇九年，一些女附中的学生捐款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铜像。铜像上没有铭文，只有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原拟“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前红卫兵们反对，要求只写“1916-1966”。最后的妥协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的评论家刘自立指出，这是“存像废史”。（《开放》2012/2）

兼听则明。如果贵刊公正无私的话，请将我这封信发表。

### 3、陈建华谈“百度百科·宋彬彬”词条

读了贵刊第80期，对“卞仲耘案”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宋彬彬把积压了四十多年的心里话说出来，对她本人有好处，对我们认识文革的复杂性更有好处。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纠正了不实之词。“百度百科”上的“宋彬彬”词条已经吸收了你们的研究成果。下面是这个词条的摘录：

宋彬彬的老师同学都可以证明她不但从未改名为宋要武，也从未参与或组织过任何打人等暴力行为。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她曾与同学两度劝阻殴打卞校长的暴力行为，并参与抢救卞校长。但她与毛泽东

的照片使她格外突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冒名文章更使全国人民都相信她改名为宋要武。虽然她和她的家庭都被江青及其亲信迫害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40多年来对她持续的造谣污蔑也是文革迫害的最长时间的继续。请看电子版《记忆》47期和49期,是女附中校友历经7-8年采访了上百位师生而成的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专辑,40多年来关于宋彬彬的传说应该还原真相了!

三十年来,不断地听学术界说要“重写历史”。我认为,最需要重写的,就是文革的历史。这个词条的重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贵刊穿透了种种人造的迷障,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愿意面对真相,愿意摒弃成见的人还是多的。百度百科宋彬彬词条的重写告诉我们,对社会、对后代负责任的,大有人在。

---

